

FD &

金融与发展

2017年9月号

对李卡多·豪斯曼的采访

第30页

紧缩时期的健康问题

第42页

戈尔德论风险

第46页

全球合作

一场艰苦的战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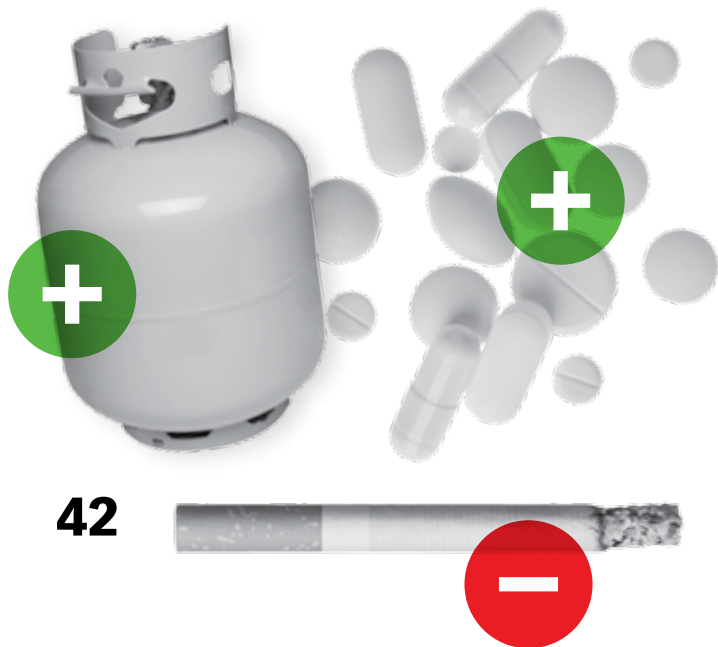
目录



全世界必须在容易高涨的对多边主义所带来利益的质疑中解决复杂的全球性问题。

全球合作：一场艰苦的战役

- | | | | |
|----|---|----|--|
| 4 |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英国脱欧
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合作一直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但目前却面临新政治势力的挑战
哈罗德·詹姆斯 | 18 | 恐怖与犯罪之关联
国际犯罪组织和武装分子如何勾结起来在世界各地转移资金
道格拉斯·法拉赫 |
| 10 | 虚假利润
跨国公司的避税和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国际税收体制
迈克尔·基恩 | 22 | 通向影响力之路
中国采用了多管齐下的方式来增加其在制定全球经济和政治议程中的作用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 |
| 14 | 安全稳健
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有助于保障各大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营
托拜厄斯·艾德里安、阿迪提亚·纳拉因 | 26 | 处于变革中的银行业
新科技的发展必将重塑金融服务业
托马索·曼奇尼·格瑞夫里 |



42

本期还有

- 42 紧缩时期的医疗卫生问题
当公共预算不能增加时,有针对性地降低税收并提供补贴有助于提高民众福祉
拉玛南·拉斯梅纳理恩、伊恩·帕里
- 46 风险与复杂性
全球一体化和新技术意味着快速的进步以及更高的风险
伊恩·戈尔丁、克里斯·柯塔纳
- 50 投资女性,促进发展
投资女性健康和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大卫·E.布卢姆、迈克尔·库恩、克劳斯·普雷特纳
- 56 创建市场
创建新市场对于增加私人投资和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莫滕·吕克·劳里森、洛里安·莫尔德斯



60

其他内容

- 30 经济学人物
心怀使命的反传统斗士
卡米拉·安德森采访李卡多·豪斯曼,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发现驱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 34 图表释义
劳动者损失
劳动者从收入大蛋糕中能带回家的收入越来越少
玛利亚·约瓦诺维奇
- 36 前沿
普惠金融的倡导者
本诺·恩杜卢论述为什么应该让更多人获得金融服务
- 38 观点
我们真得信任专家吗?
随着信息渠道的快速发展,专家的角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奈梅特·沙菲克
- 58 书评
《提供工作:通过逐一就业实现脱贫》,莱拉·贾纳
《从全球化到本地化:商品产地的转移与全球化的终结》,芬巴尔·利夫西
- 60 货币
诱人的纸币
最近重新设计的面额为50欧元的纸币是欧洲最常用的货币
埃斯特·巴拉日



30



全球合作

——一场艰苦的战役

本期《金融与发展》关注世界所面临的最明确的挑战：如今，对有关多边主义所带来利益的怀疑日益增多，全球一体化也进一步加深，在此背景下该如何解决那些复杂的全球性问题？

距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有十年，民众对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缺乏有意义的工作岗位的不满，导致部分国家转向更关注国内的政策。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以及IMF的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在对战后经济秩序（英国和美国是战后经济秩序的主要建筑者）的概述中指出，这样做的风险非常大。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会破坏本已非常有限的对重大事件——如全球货币和贸易流、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洗钱、流行性疾病以及移民——的处理能力。

事实证明，国际税收是最令人头疼的。IMF的迈克尔·基恩写道，无法对20世纪20年代达成的框架进行再思考达成一致，导致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间展开税收竞争。IMF的托拜厄斯·艾德里安和阿迪提亚·纳拉因指出，尽管国际监管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要坚决反对那些开历史倒车的改革，以确保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金融科技是全新的金融服务，大有发展前途，但其也为全世界各国政府带来了更大的监管挑战。最后，IBI顾问公司的道格拉斯·法拉赫指出，由于国际犯罪集团常常“领先于”国家执法机关，因此如果没有更强的国际合作，那么将无法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

此外，我们还探究了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对女性的健康和进行更多的投资将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在紧缩的情况下，税收目标的变化和补贴如何能改善公共卫生，而不对公共预算造成过多的负担。FD

卡米拉·伦德·安德森（CAMILLA LUND ANDERSEN），主编



本期封面

全球合作常常像是徒劳的、永无止境的苦差事——一旦我们在一个区域取得了进步，那么在其他区域则会出现倒退。插画家迈克尔·瓦拉克萨（Michael Waraksa）在《金融与发展》九月号的封面向我们展示了那些相信和愿意合作的与不愿意合作的人。

主编
Camilla Lund Andersen

责任编辑
Marina Primorac

高级编辑
Maureen Burke James L. Rowe, Jr.
Natalie Ramirez-Djumena Chris Wellisz
Nagwa Riad

助理编辑
Bob Ahmed Maria Jovanović
Eszter Balázs Nadya Saber
Bruce Edwards

在线编辑
Marie Boursiquot Lijun Li

生产经理
Niccole Braynen-Kimani

文字编辑
Lucy Morales

编辑顾问
Bernardin Akitoby Rupa Duttagupta
Celine Allard Thomas Helbling
Bas Bakker Laura Kodres
Steven Barnett Tommaso Mancini Griffoli
Nicoletta Batini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Helge Berger Inci Otker-Robe
Paul Cashin Catriona Purfield
Adrienne Cheasty Uma Ramakrishnan
Luis Cubeddu Abdelhak Senhadji
Alfredo Cuevas Alison Stuart

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
地址：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7430
传真：(202)623-7201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

©版权所有，IMF，2017年。翻印本刊文章
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 623-8300
传真：(202) 623-6149
网址：<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中文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010-88190916
传真：010-88190916
邮政编码：100142
网址：<http://www.cfeph.cn>
英文版刊号：ISSN 0015-1947
中文版刊号：ISSN 0256-2561



说再见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金融与发展》也免不了会受到巨大变动的影响。玛丽娜·普里莫拉茨 (Marina Primorac) 担任《金融与发展》的执行主编已有八年，在今年年底她将从 IMF 光荣退休。在她的领导下，我们的杂志越办越好。《金融与发展》在前沿议题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玛丽娜功不可没，同时她还一如既往地确保了这本杂志高质量的编辑和版面水准，包括最近对杂志进行的改版。我们将非常怀念她！此外，我们还不得不和高级编辑詹姆斯·罗 (James Rowe) 说再见。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十年，此前他是《华盛顿邮报》的一名经济记者。詹姆斯会不断地调整和修改文章，直到他满意为止，而他这样做确保了我们的文章不仅可读性强，而且符合读者的需求。他真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才。FD

新书发布！

IMF 2017 年年报

促进包容性增长



- 深度解读 IMF 的政策建议、金融支持及能力建设发展，以巩固经济。
- 聚焦重要活动，包括贸易、生产力、包容性增长，以及劳动女性。
- 通过电脑和手机进行在线互动。

在线浏览年报：imf.org/ar2017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 到英国脱欧

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合作一直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但目前却面临新政治势力的挑战

哈罗德·詹姆斯

英国的脱欧公投和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的胜出带来了一种新的政治风格——这不仅发生在英国和美国，而且也波及整个世界。2016年发生的这些事件正在严重挑战着自由国际秩序，自由国际秩序是在1945年战胜纳粹主义之后形成的，并于1989—1991年在苏联解体后得到加强和更新。

虽然美英两国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设计师，并创立了联合国体系，但它们现在似乎是对此持相反观点的急先锋——它们正从多边主义转向一条不可靠、不一致且在国内也饱受争议的道路。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其他国家无法担任全球领袖，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世界其他地区也不会支持新霸权的产生。

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会议上创立，该体系在经济增长、减贫、避免破坏性贸易战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应该受到称赞。该体系还建立了一种机制，该机制到如今一直在鼓励世界各国在税务、金融监管、气候变化政策和反恐融资等诸多问题上开展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各国的核心关切是维持国际金融稳定。美国和新创立的IMF在当时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该体系试图通过将汇率与美元挂钩以及让IMF充当汇率变化的决定者，来保持国际金融的稳定。但是，在当今社会，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IMF已经变成集危机管理者、全球经济监管者和政策顾问于一身的机构；而且，美国的支配地位可能会被中国和欧盟等新势力所替代，甚至美国国内的政治势力似乎也在大力阻碍美国参与国际事务。

当今世界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来适应已经变化的经济发展的地区格局、正在转变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庞大且可能不稳定的资金流？

在1944年和1945年，多边自由国际秩序主要是在美国的倡议下、按照美国的意愿、为了美国所察觉的利益而创建的。虽然共有四十四个国家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英美两国主导了谈判。该会议的基本愿景是提倡多边主义，让所有人受益。苏联虽然也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没有批准该协定，部分原因是苏联怀疑美国的动

机，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苏联不愿向IMF提供数据，而提供数据恰恰是成为IMF成员国的前提条件。

持续失衡

当时备受争议的问题是各国在外汇支出大于外汇收入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调整——此外，对于国际秩序的讨论则主要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后未能成功创建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个教训展开。一战后，赤字国家所承受的调整压力最终导致具有破坏性的全球性通缩，以及其后的经济大萧条。设立IMF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汇率战争和竞争性贬值，而后者恰好是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通缩问题所采取的手段。

在1944年和1945年，多数国家都估计到自己将要长期处于进口大于出口的局面之中，而且美国将拥有半永久性的贸易顺差，因为在当时，对饱受战争摧残的各国而言，美国不仅是它们的主要粮食供应国，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唯一一个工程和机床产品生产强国，当时的德国和日本的生产能力已被摧毁。换言之，多数国家必须想办法筹集足够多的美元来进口所需产品。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与会代表达成的重大妥协似乎是公平的：如果某国货币存在“根本性失衡”，该国就可以被视为拥有“稀缺货币”（即美元）的国家，而且美国也将为此承担所有责任。其他国家则因此可以施加贸易和外汇限制，以减少购买拥有该失衡货币的国家所出口的产品。

但在实际中，根据新成立的IMF的表决权安排，美国有权在其他国家不能获得足够多美元的情况下，阻止就美元是否处于根本性失衡或“稀缺”状态做出不利于美国的决策。而且，到20世纪60年代，令人忧心的美元顺差已经消失，此前，美国甚至因此担心在世界范围内会出现新一轮的长期恶性通缩。其原因在于，美国通过军费支出和对外直接投资重复使用了自己的顺差，这让很多其他国家得以追赶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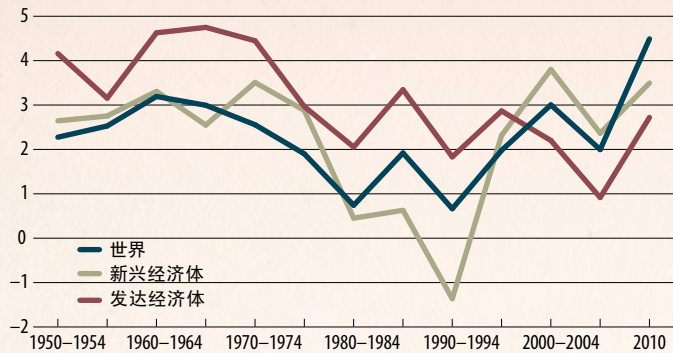
总之，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的第一个25年是卓有成效的：美国倡议的多边主义让所有国家都受益匪浅，当时的主题是增长、稳定和赶超。

图1

明智的增长

在二战后的25年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实际人均GDP（扣除通货膨胀）都实现了大幅增长。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末，新兴市场经济体实现了高速追赶。

(五年平均实际增长率，G-K美元，百分比)



资料来源: The Maddis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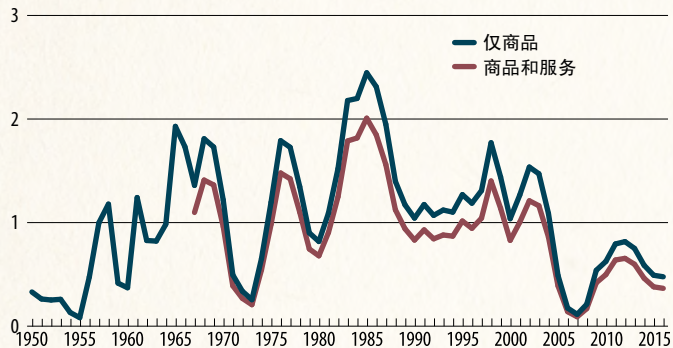
注: G-K美元是一种在既定时间点具有与美元相同购买力的假设货币。

图2

更低的比例

IMF的资源在全球收入、贸易和资金流量中的占比稳步下降。

(IMF的信贷和贷款与商品和服务贸易价值之比，百分比)



资料来源: IMF,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2017年4月, 以及《国际金融统计》; IMF员工的计算。

注: 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总价值的数据自1967年开始。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有效期内，所有国家都得到了发展。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新全球化时代，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出现了大力追赶的景象（见图1）。

在法国，二战后的那些年通常被称为“黄金三十年”，但是说三十年有点夸大其词，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末，全球金融体系似乎已经出现了动摇。可调整的固定汇率机制在1971年到

1973年期间崩溃。由于资本流动的不稳定，全球遭遇通货膨胀激增，民主和政治稳定也因此面临威胁。

多边主义的新问题

然而，多边主义在处理这些新问题方面颇具创意。1975年，主要工业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在法国的朗布依埃召开会议。该会议是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增加了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前身，也间接地是范围更大的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前身。该会议成功地解决了油价飞涨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和政治挑战，而油价飞涨的原因是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在阿以战争之后做出了减产决定。虽然在最初的时候，美国的权威人士要求通过武力来应对这个石油卡特尔的挑战，但是发达经济体最终还是采用了由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推动的替代方案，该方案运用私人资金流动将这些石油生产国纳入全球金融体系。通过该方案，全球实现了政治稳定，但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全球经历了金融市场的波动，这种波动是由于石油生产国将巨额利润存入大型跨国银行，导致巨额的资金流动所造成的。这些大型银行随后将这些巨额资金作为贷款发放给一些国家，使其能够支付更高的油价。

IMF为因油价上涨及随之造成的经济衰退而遭受重挫的发展中经济体制定了新的融资机制。但是，当银行推动的资金流动停止时——这首先发生在特定国家，接着是在1982年在多数拉美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中——IMF迈入了新的阶段，不再监管固定汇率，转而成为危机管理者，致力于协调基于IMF贷款、国家改革计划和贷款银行贷出新资金的救援行动。

20世纪90年代，在前国家计划（苏联式）经济体小心谨慎、循规蹈矩且有条不紊地管理转型的过程中，多边主义也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个年代以及中央计划的明显失败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因为多边机构从中认识到，在复杂的政治社会动荡中，平衡各个利益团体至关重要，其中包括反对党、工会、民间社会团体。因此，除了纯粹的经济问题之外，其他问题开始成为多边工作

的核心，比如政府的质量和效率、腐败程度及透明度等。

这些变化的结果喜忧参半：一方面，私人资本流动的激增推动了经济的大幅增长和经济活动重点地区的重新分布，并让数十亿处于极度贫困的人口摆脱了贫困；但另一方面，资本推动的全球化也是不断波动，难以维持稳定，而相对于全球收入、贸易水平和资金流量，多边机构的资源也较以前出现了缩水（见图2）。

亚洲金融危机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重新配置和去中心化的多边主义带来了重大智力挑战，而这种挑战又在其后的应对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以不同的形式重挫了老牌富裕工业国家，尤其是欧洲。多数遭受危机的国家都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进行了解读，其中也包括一些在美国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学家，他们主要从美国的观点和美国的利益出发做出了解释。其中一种解释认为，资本市场流动的突然中断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调整计划的强制实施，让西方机构得以以最低的价格获得富有活力的地区的大量资产。在危机开始时，日本曾提出设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但由于美国的反对，这个建议最终未能通过。

一些大型亚洲国家决定不再依靠IMF，转而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来寻求自我保障——而外汇储备又需要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这个观点的逻辑恰好与重商主义的出口促进计划一脉相承，依赖于各国通过把本币与外币——通常是美元——挂钩来压低其货币价值。随着经常项目不平衡的加剧，曾经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判的结构性缺陷再次凸显：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和巨额赤字，前者此次主要出现在石油出口国和中国，而与此相反的后者则主要发生在美国等工业化国家。

此外，中国也提出要建立地区性机制的建议，旨在为存在国际收支等问题的国家提供支持——这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提议的另一个版本，也是全球性机构的替代机制。例如，于2000年生效的“清迈倡议”包括了10个东南

亚国家及中日韩三国间的一系列双边互换安排。根据互换安排，需要外币的国家可以从该倡议的其他成员国借入外汇（尽管到目前为止仍未发生过货币互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强化了地区性机制的发展：2010年，清迈安排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而且新的机构开始出现，特别是2013年成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通常称为金砖银行）和2016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每个重大挑战都产生了旨在改进金融和经济治理的地区性倡议。

从越来越分散的国际体系治理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经验教训。从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油价冲击到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每次重大挑战都会产生一些新的有助于多边合作和协调的方法，例如：1975年成立的五国集团和2009年成立的由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组成的二十国集团。然而，每次在卓有成效的初步会晤之后，都会伴随一个常规化的过程，该过程削弱了实现重大突破和改善政策的紧迫性及能力。

而且，每个重大挑战都产生了旨在改进金融和经济治理的地区性倡议。例如，旨在建立欧洲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欧洲货币体系，就是20世纪70年代货币危机的产物。而亚洲危机则催生了在更大范围实现亚洲一体化的举措。在欧洲，2012年成立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旨在为欧盟提供资金，干预危机中的欧盟成员国，该机制也有可能发展为欧洲货币基金。

地区性机制的大量出现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地区性货币机构和全球性货币机构如何才能有效地开展合作。对地区性机制长期持反对意见的人士认为，当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造成冲击或产生溢出效应时，这些机制毫无用处：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扩散到了俄罗斯和巴西。另一个问题是，处于区域集团外围的国家感到越来越脆弱。如此一来，对于提供金融机构——地区性资源越来越重要——和设计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各国家之间要如何协调？



1944年

布雷顿森林会议创立了IMF和世界银行，建立了与美元挂钩的稳定汇率体系，而美元与黄金挂钩。



1971-1973年

布雷顿森林相对稳定的汇率体系被打破，美国决定自1971年8月15日起将美元与黄金脱钩。



1973年

油价开始暴涨，导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危机。

1975年

五国集团在法国朗布依埃召开会议，同意个别石油生产国将巨额利润重复投入使用。

设计问题

在二战后全球保持稳定的年代，多边治理机构以三种独特的方式运行。第一种方式是在对国家间的争端进行仲裁时，扮演司法或准司法角色。目前，有很多案例看起来似乎需要仲裁：贸易争端，以及是否为了给出口商提供补贴而不公平地评估货币价值，后者经常与贸易争端相关。

但是，最近一些国家——主要是英国和其他以“主权主义”对抗“全球主义”的欧洲国家——对主权的重新强调，抵制了这种仲裁。过去，美国一直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为贸易开放辩护。

汇率失调是国际结算中一个更加棘手的难题，在最重要的案例中，即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21世纪头十年的中国，IMF回避了公开宣布某种汇率被故意低估。

多边主义的第二种形式主要涉及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就政策和一国政策与他国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向政府提供个人建议：解释和分析反馈及溢出效应，并提供替代政策。这类咨询——而不是正式的仲裁程序——是21世纪头十年讨论汇率低估问题的主要工具。此类建议的本质是私密性，其结果可能是行为或政策的变化，但外界并不知晓推动这个行为发生改善的原因和逻辑。

多边主义的第三种方式是扮演拥有公共使

命的公开说服者。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喜欢用“向掌权者讲真话”来描述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的建议。人们对秘密外交和幕后建议的局限性认识得越来越深刻。如果人们未就前进的方向是否正确这个问题真正达成共识，社会就不会前进。反全球化的恶果应归咎于人们的怀疑主义：专家、经济学家、国际机构都不值得信任。在20世纪头十年中，二十国集团和IMF开始对政策溢出效应如何影响世界进行公共评估——特别从多边主义的维度审视了贸易失衡及其原因，包括货币政策立场、结构性变化和人口发展。

这种公开的行动方式似乎更适合于注重透明度的今天——在这样的时代，信息技术似乎更不安全，秘密会泄露，而维基解密则大行其道。在当今的时代，假设任何事物都是秘密的是不明智的。

从根本上来说，信息的可得性又给人们带来了困难，因为政策建议总是非常复杂，溢出效应和反馈都需要大量的分析和解读，不能轻易地简化为简单的公式。

信息可得性

国际机构应该更像哪种角色呢？法官、牧师和精神分析师，还是说客？虽然多边机构的传统



1982年

墨西哥以及其后的大多数其他拉美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偿债危机，其中大部分是用于支付较高的石油账单。债务问题迫使 IMF 充当危机管理者的新角色。

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随后扩散到很多亚洲国家。IMF 再一次成为危机管理的核心。

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11月，由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组成的二十国集团首次在华盛顿召开会议。

角色不再可信，但是它们也发现同时担任上述三种角色是不可能的。法官通常不需要通过长篇的解释来证明自己的裁决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是客户，专注于维持推特账户的高活跃度，那么它们就会让人觉得是仅关注自己的利益，从而丧失公信力；但如果它们是秘密的——就像世界银行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那么，通过裁决的收益来衡量，它们的效率可能会更高，但会丧失合法性。

人们能够轻易地发现，为何那些建立了稳定的战后秩序的机构在难以克服的挑战面前可能会让人失望。虽然难以将人类尊严和可持续性等基本且普遍的原则应用于政策细节，但多边机构可能会利用新技术，成功地调解那些对世界的统一和繁荣构成威胁的争端。

在后危机时代，人们可以使用更多、更新的数据。过去，我们必须等待数月或数年才能获得有关经济活动量或贸易量的准确评估；而今天，我们可以实时获得更多的有关可衡量结果的数据，包括衡量健康和经济活动的的数据。以可采用和容易理解的方式管理和发布这些数据，对于形成对未来以及对个人、社会、国家如何相互作用的讨论来说至关重要。与其成为法官，多边机构可以提供针对替代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它们要做的是研究以何种方式让数据说话。

有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全新的或是以全新形

式呈现的，并且属于全球公共产品，例如防范在大众旅行时代能轻易传播的疾病、恐怖主义、环境破坏。在每种情况下，快速获得大量具体的信息对于协调有效应对至关重要：例如，哪里存在污染，该污染如何影响健康和可持续性，其源头在哪里，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即便是大型国家也无法仅靠自己来恰当地对此做出应对。

当今的有些问题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就已经被发现：例如，国家要如何避免不可持续的、让其易于遭受冲击并丧失对资本市场的信心的经常项目赤字？如何降低使其他国家面临通缩风险的巨额顺差？地区性协定无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简单的全球性解决方案也不切实际，并不可能获得共识。相反，大量数据对采取有效行动、发现如何准确地获得解决外部失衡的资金，并识别让重大外部失衡产生有害且不稳定后果的情形至关重要。相较于1944年和1945年，当今的治理对信息的依赖程度更高。**FD**

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教授、IMF的历史学家。



虛假利潤

跨国公司的避税和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国际税收体制

迈克尔·基恩

国际联盟没有自己的脸书主页，其员工不用谷歌搜索，也不从亚马逊上网购。一百年前，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涉及铁路和油井等有形的东西；特许权使用费是指对煤炭或类似产品的收费，而不是对使用品牌名称或专利的收费；跨国公司也没有主导世界贸易。

但今天，一切都改变了：世界经济见证了跨国公司的兴起、服务贸易的增长和全球资本流动；专利和电信牌照等无形资产已经成为现代商业的核心，而数字技术也为企业提供了在其业务鲜有

涉猎的国家（如果有的话）开展业务的机会。这些变化导致一些税收问题，而这些问题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时还无法想象。不过，国际联盟建立的框架仍然主导着我们对跨国公司的征税方式。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际联盟框架受到的压力与日俱增，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崩溃的边缘。

而这些压力的核心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彼此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跨国公司的避税问题，即跨国公司运用合法手段将利润从高税率地区转移到低税率地区；第二个问题是政府之间的

“税收竞争”，即政府运用低税率或其他有利的税收规定来增强对实际投资的吸引力，并减少将账面利润转移国外等避税活动对自己的影响（让其他国家的投资吸引力变小，受避税活动的影响变大）。

快速指南

国际税收是非常复杂的（这本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里仅对跨国公司业务的征税体制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国家如何确定跨国集团企业应纳税利润的核心是“公平定价原则”。这意味着在评估某个企业与同一跨国集团内其他企业的交易时，要使用该企业同非关联方开展同样交易所用的价格，从而计算该企业的利润。然后，每个国家都对用这种方式分配给集团内所有企业的利润进行征税，这些企业或是依法成立的企业，或是在该国具有明确、合理且持续的实体（业内称为“常设机构”）。这在通常被称为税收“来源”国的国家建立了征税基础。

第二步，按照“全球”税收体制，母公司所在的国家，即为了方便纳税而成为其居民企业的国家，也对其国外关联公司的所得进行征税，但通常也会对其在国外已纳税额提供抵免。但是，最近几年这一做法变得越来越少，例如在美国，虽然全球税收体制仍然适用，但是（与使用全球体制的其他国家一样）只对以红利形式转回美国的利润征税，这就是造成美国企业拥有逾2万亿美元未回转到美国的利润的原因之一。但是还有很多国家采用了“发生地”税收体制，有效地豁免了来自于国外的企业所得。因此，全世界当前的企业所得税安排看起来更像是基于来源的税收制度。

企业所得税制度中没有很多有意识的设计，没有设立世界税收组织来制定和实施税收规则（尽管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中的确包含了对某些税收政策的限制）。各国通常通过双边税收协定（目前这类协定超过了3000个）来限定税收关系，此外还有各种实施公平定价原则的指引。在过去几年中，多边主义的这些普通要素获得了有益的补充，即通过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更多内容请参见下文）

对一些最稀奇古怪的避税工具进行遏制。但是，政府和跨国公司仍然在国际税收方面存在充分的操作空间。而且，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民间社会组织认为，现有国际税收体制是受最发达国家利益所驱动的。

企业的做法

公平定价原则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因为在理论上，公平定价原则使跨国公司与开展相同业务的一系列独立企业享受相同的税收待遇。但问题是，跨国公司可以通过独立企业没有理由去做的事情来利用这个原则为自己服务。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所有这一切。跨国公司可以设法操纵其集团内部交易价格（“转移价格”）来降低其总体税收义务——例如，人为设定较低的转移价格，将产品从位于高税率国家或地区的关联方销售到位于低税率国家或地区的关联方。因此，税务机关的问题就是要找到或构建评估这些交易的公平价格，但这种做法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跨国公司内部的贸易不仅数量大幅增长，而且还涉及难以估价的项目。例如，向位于低税率国家或地区的关联方销售尚未使用的专利，而该专利的公平价格并不明确（尽管该企业可能比税务机关更精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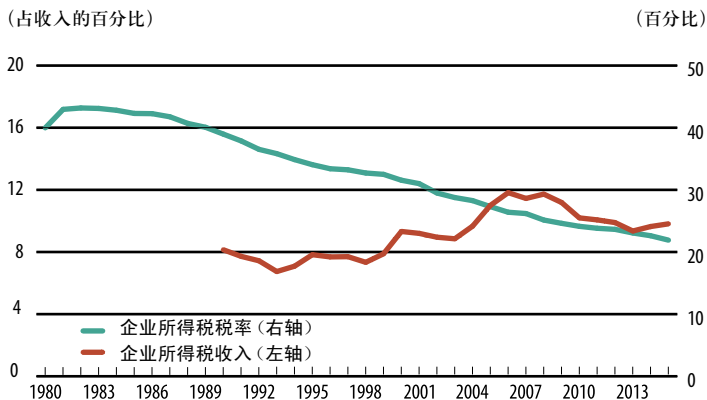
如果每个国家在制定自己的税收政策时都忽视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效应，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国家的税收状况都要比进行合作情况下的结果更差。

大量证据表明，利润转移非常普遍。据估计，2012年美国企业所得税收入的损失占其总额的比例在1/4到1/3之间（按2016年条款）。而其他国家的企业所得税收入的损失比例可能更大，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企

图1

持续下降

虽然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所得税率自1980年以来大幅下降，但企业所得税收入小幅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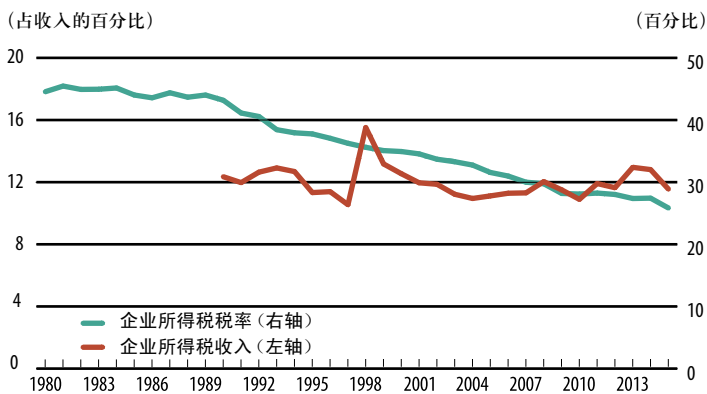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的世界收入纵向数据库(WoRLD)；国际财政文献局；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密歇根大学的世界税收数据库；以及IMF员工的计算。

注：发达经济体包括世界银行分类为高收入的国家。

图2

感受影响

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所得税率也大幅降低，而其企业所得税收入上涨幅度小于发达经济体。



资料来源：IMF的世界收入纵向数据库(WoRLD)；国际财政文献局；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密歇根大学的世界税收数据库；以及IMF员工的计算。

注：发展中经济体包括世界银行分类为中低收入的国家。

业所得税占其收入总额的比例较高，而且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其他收入来源。

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在应对各种最不常见的避税形式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该项目覆盖 15 个主要领域（比

如，限制利率下降、改善争端解决），并设置了4个最低标准，这些标准是二十国集团鼓励所有国家遵从的标准（如其中一个标准的目标是遏制滥用税收协定中的条款）。目前，该项目标准的实施得到经合组织“包容性框架”的支持，该包容性框架的成员国超过 100 个。

但该项目并没有改变国际税收体制的基本结构。甚至，其最强烈的支持者也只将其描述为“救火”。目前，尚未可知的是，“火灾”所造成的破坏是否可以通过简单地“刷涂料”进行修复，还是已经造成“基础结构”的不安全，或早或晚都必须要进行重建。

政府的做法

激烈的国际税收竞争最明显的标志是全球企业所得税率的快速下降（见图1和图2），但令人吃惊的是，发达经济体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平均来说保持小幅增长，主要原因可能是资本占其国民收入的比例在不断提高。

但是，不是只有税率是重要的。政府很善于找到通过操纵其税收制度其他方面的方法来吸引实际投资者或者避税中转移的账面利润。政府看起来对低效纳税很愤怒，但这往往听起来就像电影《北非谍影》中的警察局局长雷诺一样，在假装自己对里克酒吧中存在赌博活动感到非常震惊。

那么，政府间税收竞争又有什么问题呢？有些政府实际上欢迎税收竞争，将其作为限制公共支出“铺张浪费”的方法。但是，即便不考虑旁观者所认为的“铺张浪费”这个事实，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也很少听到这种“饿死野兽(starve the beast)”的观点了，因为很多政府手头都比较拮据。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核心问题都是通过税收竞争来限制税收收入的效率十分低下。

这是因为利己的国家税收政策产生了有害的溢出效应。如果某国想要让自己的税收制度变得更具吸引力，则该国需要吸引到更多的实际投资或向其国内转移的利润，从而扩大税基，这从该国的角度来看是好事。但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其他国家的税基就可能会下降——这对它们来说则是坏事。而如果每个国家在制定自己的税收政策时都无视对其他国家的不良影响，那么最终结果就是，所有国家的税收状况都要比它们进行合

作时的结果更差。最后，税收竞争问题的根本是征税基础的流动性，而采用公平定价原则的基于来源的税收制度尤其容易受到影响，因为实际投资和账面利润（通过各种避税方法）的转移非常容易。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没有提到那些推动税收竞争的根本因素，其主旨是通过建立“价值产生地”税收制度来修订 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际税收体制。这听起来像基于来源的税收制度，如前所述，该制度非常容易破坏竞争。此外，尽管收紧避税监管可能会限制某个税收漏洞，但这也可能让另外的税收漏洞恶化。如果政府容忍或者甚至鼓励避税，则那些有能力将其活动或利润转移到国外的企业就可以通过避税来减少其纳税额。而如果政府限制避税，让避税变得更困难，则政府可能运用其他税收手段来保护其征税基础，例如，通过进一步降低税率。

未来应该怎么做？

尽管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是修改国际税收体制的重要尝试，但很少有国家（如果有的话）认为这是根本性解决方案，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改革。有些建议保留了 20 世纪 20 年代时的体制的核心概念，例如：扩大“常设机构”的内涵，认可数字化时代的企业无须在某国设立很多实体机构就可以在该国开展大量业务。

此外，一些国家还提出了更多的根本性变革的建议。例如，欧盟委员会就重新采纳了一个建议，即在不采用公平定价原则的条件下，将跨国企业的利润在发生业务的欧盟成员国之间分配。该建议转而采用了一个反映跨国公司在各国的销售额、资产和员工数量的机械公式。这种“公式分配法”的好处在于让参与国之间的转移价格与纳税脱钩，但这种方法同样要受到税收竞争的影响——因为政府有动力去吸引包含在该公式中的任何因素，以便将跨国公司利润中的较大份额纳入到自己的征税基础中。

在美国，“基于消费地的现金流量税”最近也倍受关注，该方法可能会豁免对出口的征税，但会对进口征税。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基于消费地的现金流量税”，则转移价格会变得与纳税无关（因为进口和出口的价格在任何国家都对纳

税义务没有影响）。而且，由于消费者一般不会因为消费税率的不同而迁移，因此这种税收方法不容易受到国际税收竞争侵蚀的影响。

即使有人能够设计出 20 世纪 20 年代时的体制的理想替代制度，但这个制度的实施也会涉及困难的协调问题。总之，国家应该从协调彼此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中受益，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同意提高税率的一组国家更容易受到其他国家低税率侵蚀的影响。也就是说，虽然在企业所得税制度上进行合作的国家可以从合作中受益，但那些未参与该合作的国家甚至能从中获得更大的益处。

虽然如此，税收竞争本身也会产生更有效的合作。例如，用基于消费地的现金流量税取代标准的企业所得税的一个后果是，采用基于消费地的现金流量税的国家只有很少的利润转移问题，而其他国家的利润转移问题会变得更严重。其原因在于，为基于消费地的现金流量税国家的出口产品制定更高的价格不会影响到企业在该国的纳税义务（因为出口收入是免税的）。但是，这样会减少企业在采用传统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国家中进行纳税的义务（在这些国家，进口可从税收中抵扣），因此也会让征收基于消费地的现金流量税的其他国家承受巨大压力。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个根本性问题。公式分配法和基于消费地的现金流量税都可能改变在不同国家分配税收收入的方式。如果采用基于消费地的现金流量税，则税收收入会累计到最终消费发生国家，这与认为税收收入应该累计到生产国的观点完全不同。例如，资源生产国就不可能接受这种分配方式。因此，正如所有的税收问题一样，在重新思考国际税收体制过程中的终极关键问题是：哪些国家应该获得税收收入？**FD**

迈克尔·基恩（MICHAEL KEEN）是IMF财政事务部副主任。

参考文献：

Clausing, Kimberly A. 2016. "The Effect of Profit Shifting on the Corporate Tax B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yond." *National Tax Journal* 69 (4): 905-34.



安全稳健

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有助于保障各大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营

托拜厄斯·艾德里安、阿迪提亚·纳拉因

2008年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加倍努力、多管齐下地创建更加安全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自那以后，政策制定者便相继加入到金融危机防控大军中来，确保各大国际银行增强应对冲击的能力，尽可能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惨剧。但是，政策制定者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抵挡压力的同时，不至于在改革的路上倒退。

既然危机后的金融体系是监管执行的最后一步，政策制定者于是纷纷开始评估改革可能带来的意外后果。而重点将是确保世界各大银行资本和流动性显著提升的势头不受破坏。如果能够对国际监管标准进行些许调整，以适用于更多银行和银行系统，这也能对改革起到一定的引领和支

持的作用。

强化的监管标准提升了大型国际银行的恢复能力，新的监管标准要求银行提升承担损失的能力，增加现金类资产的比例，以达到偿债要求，换句话说就是增加流动性。此外，银行业还应该接受更严格的监管，必须学会管理风险以保证安全运营（如应对经济衰退），并提高企业管理质量。

如果银行确实出现困难，目前已有国际协议规定了银行应该如何重组或者关闭（按有关法规来解决），谁来承担经营失败的损失，以及以什么方式来承担。关于整个金融体系应该如何处理危机也应该达成共识，包括一些所谓的影子银行，这些金融机构开展筹集资金和放贷等银行类活

动,却不受银行监管,但目前在此方面也有所进展。

善加评估

市场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必须注意到危机后新监管可能带来的意外后果。作为对于新监管制度的回应,几家多边机构都在评估金融改革的经济影响。大部分机构得出的结论是,收效远大于成本。然而,在一些情况下,监管改革的一些调整还会进一步降低成本,同时又保证收益不受影响。评估改革影响的机构中,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算是其中之一,它的主要职责是监控全球金融体系,提供维护稳定的方法建议。金融稳定委员会包括来自25个国家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以及各大国际金融机构,例如国际清算银行、IMF和世界银行。

推进国际合作并开发金融监管标准的机构包括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由银行监管机构组成)等,这些机构也必须考虑它们自身制定的标准是否具有普适性。这些标准形式多样,有最低标准、指导方针、原则、规范、良好实践等等。这两大机构成员代表的经济体中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也有一些新兴经济体。在这些经济体中,银行很重要,但银行只是复杂的金融体系中的一部分。但是,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银行业监管指导方针,对于很多新兴市场 and 主要依赖大型银行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

全球适用性

巴塞尔银行监管标准最初是针对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银行而设计的,目的是通过给各成员国设定最低标准来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些标准反映了当时成员国所辖地区的最佳实践,并从一定程度上让人们相信国家监管体制依然有效,国家银行系统也运作良好。

金融危机后,监管标准的关注焦点集中于那些对国际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的金融机构上,这些金融机构的破产将对很多国家造成破坏性影响。大部分的危机后改革计划目标都是降低这些系统

重要性金融机构破产的可能性,如果破产了,则要将广大纳税人的损失降到最低。这些改革计划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加强国家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危机时期都能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

因为大部分国家没有参与到标准制定的讨论中来,一些监管机构和其他机构就质疑这些标准的普适性。此外,因为它们关注的是活跃于国际舞台之上的大银行以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那这些标准之于那些发达经济体中没那么复杂的金融系统或者没有多少系统性的金融机构的适用性就遭到了质疑。这种批评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讨论是否需要金融监管的普适性做出规定,也就是说,是否需要保证这些标准适用于金融体系和/或金融机构。

金融危机后,监管标准的关注焦点集中于那些对国际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的金融机构上。

这些标准的制定者也做出种种努力,提高它的全球适用性,加强各级别监管对这些标准的接受程度。

第一,在工作中加入一系列体验,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巴塞尔委员会在危机后都扩充了会员规模,增加了几个新兴市场国家。它们还邀请地区监管组织的代表前来参会。巴塞尔委员会(得名于其所在的瑞士城市)更是从非成员国中邀请监管咨询团队、地区性及各种主题小组以及成员范围更广的国际组织(如IMF)作为一些重要法案的决策咨询者。

第二,一些关键标准提供的一系列方法的复杂程度各异,不同国家可以选择最适合本国银行和银行集团的方法。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巴塞尔协议II,它规定了最低资本金额的比例。这一资本水平是根据银行面临的风险规模而确定的。巴塞尔协议II提供了计提信用风险资本的四种方法,即简化法、标准法、基础内部评等法和进阶内部评等法,以及操作风险的三种处理方法和市场风险的两种评定方法。这种标准基于这样的理念,

即简单金融系统和金融机构可以随着其操作的进化进阶到使用更复杂的方法。此外，巴塞尔协议II的几项规则也允许一些国家从标准法降到更简单的计算方法。

核心原则

第三，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出台，之后成为银行审慎监管的国际标准。在当年十月的IMF及世界银行年会中，国际金融界对于这个核心原则都予以了肯定。这些原则经过两次修订，根据国际接受的管理规范和最低标准，给出了预期。这些原则涵盖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议题，包括银行准入、准出和运营要求；监管机构的权力、责任、独立性和义务；以及审慎监管标准指导说明以及银行面临的不同风险类型的管理指导意见。这些原则的制定适用于一系列地区，并将作为IMF和世界银行定期审查各国财政金融部门时评估标准的关键构成部分。

为使巴塞尔指导意见适用于所谓的微型金融机构，也就是那些专门为信贷服务水平低的人提供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各方也都做出了很大努力。

第四，为使巴塞尔指导意见适用于所谓的微型金融机构，也就是那些专门为信贷服务水平低的人提供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各方也都做出了很大努力。这也是更大范围的普惠金融计划的一部分。普惠金融是指将所有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人和公司纳入到金融体系中来（包括银行业）。

最后一点，近年来也有一些简化监管框架方面的认真尝试，这些尝试植根于金融危机的经验，复杂的规则难于实施，难以监管。这些简化或许能增加普适性，但也可能带来风险敏感度的损失。这需要权衡取舍，同时考虑一些金融活动的复杂本质，这就决定了制定一种“一刀切”的普适性方法很难发挥实效。

尽管各方在不断努力制定适用于不同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标准，但是国家监管者，尤其是那些监管不太复杂金融体系的，则迫切想要搞懂

这些不断推出的新标准以及旧标准的修正版。金融危机以来，对于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关注的不断加大也加剧了这些担忧。那些不被认定为系统性的银行担心有些监管要求有一天也会落到自己身上来，尽管由于规模小、商业模式简单，这些监管要求对于这些小型金融机构不一定适合。这就需要落实与非系统性银行风险相称的关键监管，但至于落实方法，目前还未达成统一的国际共识。

在一些地方，例如美国，监管者制定了分级制度，用资产规模和复杂程度来决定监管方法的严格程度。进一步的提案还在讨论之中，旨在降低美国社区银行的监管负担。这种相称性的问题也在欧洲引起了广泛讨论，在欧洲，小型储蓄所和地区性银行怨声载道，抱怨在这些监管规则下向监管者和公众报告的合规成本过高，即使是它们根本不属于系统性金融机构。与此同时，欧美两大洲的监管机构都在小心试水，因为它们意识到即使是小机构里的问题，集中起来也能引发系统性问题。美国20世纪80年代所发生的储蓄与

贷款危机正是这种情况。一些监管机构还有另外的担忧，由于它们目前的资源都集中在系统性重要银行身上，因此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和能力，像以前那样来监管小型公司。

相称性

相称性的问题在各国都有出现。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体系较为简单，愿意将这些标准视作为成功指南，也就是日后其金融体系也终能达到的标准。这时候，它们就更希望这些标准能够更符合自己国家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则担心如果他们无法如规定那样满足标准要求，投资者可能会对其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有错误的看法，这将会增加进入国际市场的成

本。为此，发展中国家官员则寻求建议，希望识别出那些适用于本国并能进一步确保金融稳定性的标准和管理规范。他们也想知道如何根据有限的资源来优先实施。随着金融体系不断发展、日渐复杂，这些官员也在不断寻求能帮他们充分落实这些标准的策略、途径和时间规划。

在这里，IMF 就发挥着重大作用，通过长期常驻顾问和短期专家的到访，为 100 多个国家提供金融部门稳定性和市场开发方面的技术援助。金融部门将近一半的援助集中于加强银行业监管方面，方法是帮助各国采取适用的管理规范和国际标准，如有时有偏差，则帮助调整这些标准以适用于当地的情况。IMF 与世界银行一道，在立法与体制改革、安全网建设、会计和审计以及公司治理框架方面也帮助各国做好准备，以实施更加复杂的标准。

危机后监管改革已经大部分完成，针对非系统性重要银行所制定标准的适用性相称的问题也应该进一步明确，并提到标准制定机构的议事日程上来，纳入国际论坛的讨论之中。如此一来，将增加改革的吸引力，降低改革倒退风险。此外，还应应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提供良好指导，指导它们如何识别并实施最合适本国国情的标准和规范，而这一切都需要国际社会的热情和积极参与。FD

托拜厄斯·艾德里安 (TOBIAS ADRIAN) 是 IMF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金融顾问，阿迪提亚·纳拉因 (ADITYA NARAIN) 是该部副主任。

IMF在线图书馆

免费预览IMF精选出版物，包括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平等、亚洲、能源以及自然资源等。

elibrary.imf.org/fd917



免费预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恐怖与犯罪 之关联

国际犯罪组织和武装分子如何勾结起来在世界各地转移资金

道格拉斯·法拉赫

在苏里南的丛林深处，矿工们从地表挖出成吨的红土，并利用一个人工挖掘的原始沟渠从红土中提取黄金，其使用的水银污染了附近的河道。这些矿工不受劳动法保护，他们通常必须贿赂当地的官员才能到当地的矿厂谋得一份工作，周薪50美元——这与金矿中间商2.4万美元的利润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跟矿工们劳动密集型作业完全相反的是，运输黄金的中间商将黄金输送到世界市场是通过加密的手机应用软件（如WhatsApp和Signal）进行沟通的。对于其中一些黄金，他们会开出高于实际价值的发票，以便对其他不法活动的所得收入进行洗钱。还有一些黄金看起来像是从其他国家进口来的，以此来隐藏其真正来源或掩盖可卡因和海洛因的交易。还有一些黄金最终进入阿联酋迪拜黄金集市，在那里黄金可以迅速换成比特币、美元或者欧元。

苏里南（南临巴西，原为荷兰殖民地）的非法金矿，向我们展示了犯罪分子是如何嫁接电子时代高科技于传统方法来帮助他们避开监管，在全世界各地肆意转移资金，进行大宗商品交易的。运用先进软件，他们将一个大陆上的黄金转化成另一个大陆的加密数字货币，而这几百万美元的交易在世界正规金融体系中完全不留任何痕迹。

犯罪活动的盛行及其活动范围的全球化提醒我们，加大世界监管者和执法部门的合作刻不容缓。

非法采伐和采矿

开采黄金只是非法收入的一个来源，其他还包括销售麻醉药品、非法采伐、偷盗矿产以及文化遗产。涉案总金额令人瞠目结舌。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2017年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预测11类初级非法市场年营业额达到1.6万亿—2.2万亿美元。毒品交易最是利润丰厚，收入达到4260亿—6520亿美元，而非法采矿收入估计在120亿—480亿美元。报告指出，“跨国犯罪还会持续增长，除非其高利润低风险的模式受到挑战。”

虽然国际执法当局在截获这些不法资金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各国政府仍处于被动反应模式，最多也就查获了几部涉及非法金融活动的电影，然后草草宣告了事。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一份关于非法经济的报告指出：“犯罪组织不仅利用了执法能力和政策的漏洞，而且还在高科技、先进工具以及阴谋策划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确，正是那些实现国际化、保证私人跨国商业活

动安全的力量让我们不再安全。”

海关检查是监管的一大关键弱点。为了干扰国际供应链的正常运作，通常只有5%的通港货物接受政府部门的检测。他们仅仅依赖于科技、情报以及国际合作等手段来检测非法货物。

跨国犯罪集团有时会与游击队或恐怖组织结成暴利项目合作伙伴。在六年时间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和当地犯罪集团利用一批当铺，转移了47吨的非法黄金，价值14亿美元，这些黄金被运送到各大国际精炼厂，其中一些在美国境内。美国执法部门发现，伊斯兰激进组织——黎巴嫩真主党通过阿拉伯半岛一家接收非法黄金的精炼厂转移了大量非法资金。

黄金逐渐成为首选媒介是因为它利润丰厚，同时又能轻松地转换成其他货币。据2013年布隆布格的一篇报道称，“可卡因的生产通常需要六个月的时间，并且还必须具备相关知识，而在哥伦比亚丛林里进行的非法采矿，一个星期就可以采出两千克黄金。”1000克可卡因售出后可获收入2570美元，而1000克黄金的价格则是它的好几倍。

加倍努力

为了应对非法资金流动日益复杂的局面，执法部门和跨国组织必须加倍努力。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已建立非法市场次犯罪指挥部，而美国财政部也在运用其广泛力量惩罚那些通过美国银行体系进行洗钱的银行。联合国通过了多项涉及非法金融活动的决议：2003年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2005年正式生效的《反腐败公约》等等。

总部位于巴黎的金融行动专责委员会成立于1989年，该委员会建立了打击金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国际标准，并对各国落实其推荐方案进行监控。IMF和世界银行则在制定必备法律的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和相关培训，以打击非法资金流动并制定出相关国际政策和法规。在过去15年里，IMF帮助制定国内和国际政策，以打击洗钱

和恐怖主义融资行为。IMF还从国际和国家层面分析了这些政策及其如何与虚拟货币、伊斯兰金融、腐败的成本、减少腐败的策略以及代理银行关系的退出等诸多问题相互作用。

虽然国际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洗钱及相关活动还是屡禁不止。

贝鲁特的黎巴嫩加拿大银行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国际犯罪网络是如何利用金融和商业转账在五个大洲进行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毒资洗钱行为的。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发现，来自南美的毒品装运到欧洲和中东地区进行贩卖，所得收益通过黎巴嫩金融体系以及通过出售在美国购买的二手车和在亚洲购买的消费品等渠道来非法转移资金。从巴拿马、多个离岸避税港和美国的账户使用情况可以看出，监管体系在监测这些交易方面存在着不足之处。据该此项调查的一位负责人大卫·亚瑟(David Asher)表示，这笔资金最终流入黎巴嫩加拿大银行，而该银行的主要客户就是黎巴嫩真主党。

银行破产

美国财政部的新闻通稿称，2011年美国调查后指证一家银行“存在重大洗钱嫌疑”并充当真主党的金融工具，之后该银行倒闭。但是，该银行只是世界众多相似金融机构中的一个；指证及关闭这家银行耗时经年，消耗资源无数，从而使得在其他地方复制这一做法的成本极为高昂，且推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

委内瑞拉成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一个重要的集结地，也是毒品和其他哥伦比亚出产的非法货品的主要中转站。委内瑞拉的活动延伸范围很广，甚至远达欧洲的“袖珍国家”安道尔公国。2015年3月，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指证安道尔私人银行(BPA)“存在重大洗钱嫌疑”(但该指证在2016年被撤销)。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就是该银行的一个客户。据美国财政部通知，这两家企业通过建立空壳公司以及设

计“复杂的金融产品”，以牟取来自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资金。两年间，“安道尔私人银行大约处理了20亿美元的洗钱项目”。

2015年9月，在位于德国加尔米施-帕滕基兴的乔治马歇尔中心所举办的一次国际安全会议上，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菲利普·布里德洛夫上将（General Philip Breedlove）指出：很多为恐怖主义提供金融服务的民族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与大多数的民族国家不同。他们不是在试图改变游戏规则。正相反，他们在不同领域进行着完全不同的游戏，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已经不再具有约束力。

一些民族国家，不管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例如美国和中国以及欧盟，都有资源且有针对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自行展开有意义的打击行动，但是只有区域协同、多边参与的方法才最有效。

诸如加密货币这样的革新技术向我们提出了另一项挑战，包括日本、韩国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正在采取多种监管方法加以应对。使用加密技术进行的沟通无法被执法机构和情报机构所侦察到，确保了守法公民的隐私，也使建立一个通用的全球措施变得异常困难。

不记名股票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相对简单的方法，例如消除不记名股票公司，并要求指定一个人对公司及其相应的银行账号负法律责任。而正是由于不记名股票公司的存在，使得对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金融网络以及黎巴嫩加拿大银行的调查遭遇了重重困阻。

全球金融诚信组织报告称，“公开透明是抑制一切非法活动最强且最有效的手段”。国际犯罪分子不可能仅依赖现金就能转移大量活动款项；他们必须能“进入国际金融体系，而要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则需要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及其货源严格保密。”

第二步则是要对银行透明度最低标准达成一

致，并确定如何追踪并控制疑似恐怖主义以及有组织犯罪的资源。几十个离岸银行避险场所的存在为几十亿美元的非法收入提供了避险天堂，并且基本没有暴露的风险。近些年来，对于存在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资金是非法活动收入的情况，一些国家不断放开其银行保密制度——瑞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最后，对跨国犯罪组织以及恐怖主义达成共识的国家必须迅速团结起来，巩固联合多边监管框架，使其足够灵活，能够适应快速发展的技术和金融活动——不管是合法还是违法活动都包含在内。各国团结一致必须成为重中之重，IMF、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可以在多国之间建立共识且在国家利益纠纷中充当诚实中介人的多边机构也应加入到行动当中。

“公开透明是抑制一切非法活动最强且最有效的手段。”

自由灵活是一切框架行之有效的关键。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所存在的生态系统能够迅速利用，甚至提前预测新的通信技术、金融工具以及系统间的缝隙。而在各个民族国家所存在的世界，不仅转变过程非常缓慢，而且还存在着各种纷繁复杂、需要公开讨论的新挑战。

上述措施不能保证完全杜绝洗钱活动和恐怖主义融资行为，因为它们可能会得到与其沆瀣一气的政府的庇护。但是，通过这些措施，至少能够增加犯罪集团利用商业和金融合法渠道的操作难度。FD

道格拉斯·法拉赫（DOUGLAS FARAH）是国家安全咨询公司IBI咨询公司的总裁，在1985—2005年期间担任《华盛顿邮报》拉丁美洲和西非地区记者。



通向影响力之路

中国采用了多管齐下的方式来增加其在制定全球经济和政治议程中的作用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

中国是经济强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1.5 万亿美元，年国内储蓄超过 5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约 3 万亿美元，对其他国家的净债权达到 1.8 万亿美元。

虽然拥有巨额金融资源，但中国仍然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其人均 GDP 仅为美国等富裕国家的 1/5。而且，中国的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刚开始进入与其经济规模逐渐匹配的过程。

一些国家依靠其运用资源的能力，在全球金融和地缘政治方面发挥与其规模不相称影响力，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例如，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英国和瑞士等一些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在全球金融和地缘政治方面比中国更有影响力。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而中国也成为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和抓住机遇获得更大影响力的范例。

在 20 世纪头十年，随着中国的金融影响力和外汇储备增加，中国开始运用自己的资源扩大其经济和政治影响范围，例如向其他经济体提供投资、援助和各种形式的金融支持。这些投资或援助的接受国是其亚洲邻国以及一些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体。其中一些国家拥有大量自然资源，这正是中国制造业所需要的。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美洲的累计投资额分别达到 2900 亿美元和 1600 亿美元左右。此外，中国还向一些不能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或者不愿意向西方机构和西方国家贷款的国家提供资金。2015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宣布，向巴方的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 460 亿美元的金融支持。同年，习主席访问非洲，提升新型中非战略伙伴关系，在工业化、基础设施、绿色发展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开展合作。中国提供了 600 亿美元资金用于赠款、贷款、贷款注销和发展基金。

中国一向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特别是在政治事务方面，中国的援助和投资不附加任何条件，例如要求经济改革。正如习主席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峰会上所说，“中方支持非洲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

中国的在国外的经济活动引起了某些吹毛求疵者对中国资金是否给接受国带来了净收益的讨论——中国是否促进了接受其所提供的援助和贷款国家的发展，中国的资金是否支持了腐败的政府，是否让贪官污吏发家致富，是否给接受国带来了长期的债务负担。

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的大力援助对非洲的经济发展和人权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另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的援助事实上是提供给较贫穷的国家，尽管其中多数国家都是资源丰富国家。中国的投资者比西方国家更愿意向政治上欠稳定的国家进行投资。总之，学术评估是综合性的——中国的资金在非洲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对一些部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

虽然中国对非洲和拉美的投资及援助增强了其与这两个大陆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

但是这些商业和慈善举措并未受到国际社会，有时甚至是接受国的欢迎，因为其中一些项目使用了中国的劳动力和材料，对当地人的就业和行业发展利益有一定的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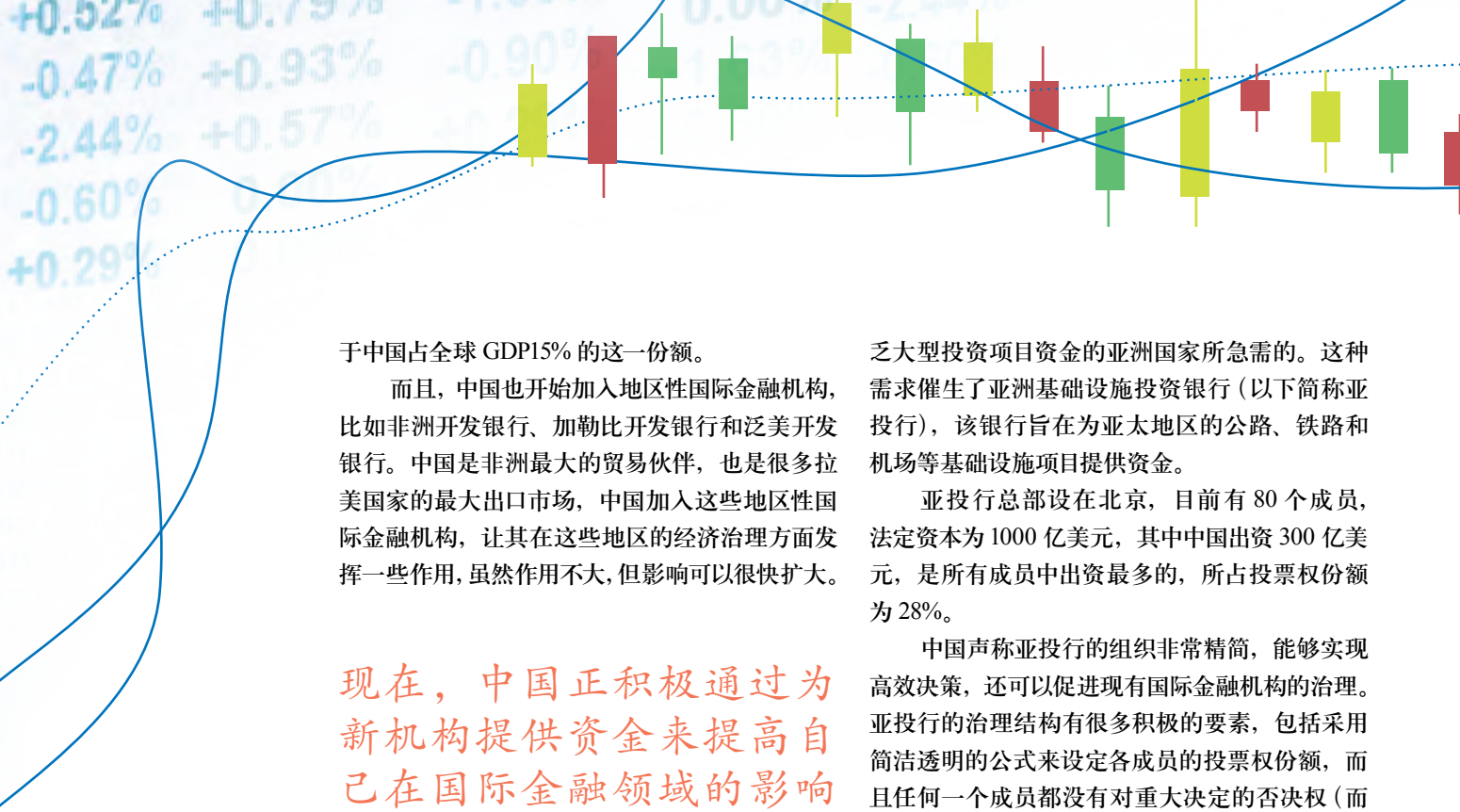
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的国际经济关系性质的改变可能会有效地提升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人非常善于学习，在环境需要的情况下，会采用务实的方法调整战略。

中国人非常善于学习，在环境需要的情况下，会采用务实的方法调整战略。

目前，中国采用多管齐下的方法来制定全球议程：第一，中国逐渐提高自己在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甚至还加入了一些与其不存在直接和即时利益的国际机构。这让中国可以从这些机构内部来改变游戏规则。第二，中国建立了自己可以主导的多边机构，这让中国能够控制游戏规则，并且巧妙地促进现有多边机构的改革。第三，中国联合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新机构，这意味着中国与那些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潜在竞争对手的国家建立了互信并加强了经济联系。第四，中国运用其他国有资源（包括国有银行和开发机构）来提高其在全球金融领域的影响力。

改变现有机构

中国全球战略的第一个要素是增强其在现有多边机构中的影响力。作为反映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量变化的一部分，中国在 IMF 的投票权份额最近从 3.8% 提高到 6%，而美国和日本的投票权份额分别为 16.5% 和 6%。中国在另外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投票权份额分别为 5% 和 6%。虽然这些投票权份额都比过去有所提高，但仍然低



于中国占全球 GDP15% 的这一份额。

而且，中国也开始加入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比如非洲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很多拉美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中国加入这些地区性国际金融机构，让其在这些地区的经济治理方面发挥一些作用，虽然作用不大，但影响可以很快扩大。

现在，中国正积极通过为新机构提供资金来提高自己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

中国愿意按照现有机构的条款加入这些机构，而不是以要求改革作为其加入的条件。2001年，中国签字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以向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开放市场的承诺为条件，获得了对外国出口市场的更大准入。既然中国现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中较大且富有实力的成员，中国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影响该组织制定和实施国际贸易原则。

2016年1月，中国加入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章程规定，该银行只能给那些“采用多党民主和多元主义原则”的国家提供帮助。令人惊讶的是，中国愿意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成员，尽管该章程的要求似乎与中国共产党的原则不一致。对该做法的一种解释是，中国对民主的理解与西方所理解的自由和开放的民主不同；另一种看似有理解释是，中国在有意成为现有机构的成员时，愿意做出妥协。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巧妙地通过这些机构的内部发挥影响力，而不是在外部简单粗暴地运用政治或经济力量。

现在，中国正积极通过为新机构提供资金来提高自己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中国领导人认为，通过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中国可以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资金，因为这是那些缺

乏大型投资项目资金的亚洲国家所急需的。这种需求催生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该银行旨在为亚太地区的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

亚投行总部设在北京，目前有80个成员，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资300亿美元，是所有成员中出资最多的，所占投票权份额为28%。

中国声称亚投行的组织非常精简，能够实现高效决策，还可以促进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亚投行的治理结构有很多积极的要素，包括采用简洁透明的公式来设定各成员的投票权份额，而且任何一个成员都没有对重大决定的否决权（而在IMF，美国的投票权份额足以让其行使否决权）。此外，发展中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亚投行处于主导地位，它们在亚投行中的影响力可能比其在任何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中的都要大。

亚投行的设立也反映了中国对于全球治理规则缓慢改革的不满。中国目前掌握了主导权，寻求在现有规则的基础上实现全球治理规则的改革，因为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认为，现有规则是由主要发达经济体制定的，也主要是服务于这些发达经济体的。

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同时，中国也在由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组成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中发挥领导作用。金砖国家经济体占全球GDP的约1/4，占世界总人口的2/5左右。它们需要在主要多边机构的运行和帮助设计国际金融治理规则和程序的改革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有些人曾经怀疑，金砖国家之间是否拥有充分的共同利益，是否只是个清谈俱乐部。但中国在其中看到了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并且抓住了这个机会。

2015年6月，金砖国家设立了法定资本为500亿美元的新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旨在

促进金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该银行的五个成员拥有相同的投票权份额，没有成员对多数表决通过的决议拥有否决权。同时，金砖国家还共同建立了外汇储备库安排——应急储备安排。该储备库总规模为 1000 亿美元，其中中国出资 410 亿美元。

尽管有些人怀疑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问题上的合作能力，因为它们缺乏充分的共同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有时还是相互冲突的），但金砖国家还是取得了成功。在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建立更强的金融联系，以及设立现有全球金融架构的替代机制，帮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的领域实现突破。而通过运用自己的巨额金融资源，中国已经成为金砖国家的领袖。

“一带一路”倡议是礼物还是陷阱？

2013 年，习主席提出了两个重要经济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称为“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但不限于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古丝绸之路实际是促进欧亚大陆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各种类型道路的总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涵盖亚洲、欧洲和非洲，实现很多彼此存在很大差异的经济体之间的互联互通，这些经济体中既有经济上充满活力和富裕的经济体，也有目前贫穷但具有巨大经济发展潜力的经济体。

2014 年 12 月，丝路基金开始运行，首期资本金为 400 亿美元，其宗旨是遵循市场原则，达到或超过最佳国际治理标准。中国明确表示，“一带一路”项目不会鼓励和容忍较低的技术、环境或治理标准。

“一带一路”倡议的融资目标为 1 万亿美元，既能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又能推动中国西部和南部内陆省份的发展。

此外，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也在扩大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部分作用。例

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在国外经营的中国企业以及国外企业提供境外贷款，截至 2015 年底，其境外贷款总额达到 3280 亿美元，占其贷款总额的 1/5。另外，中国进出口银行也通过提供贸易融资，来扩大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战略扎根

中国决心通过直接和间接方法来发挥其作为全球经济强国的作用，既对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发挥影响，也按自己的意图重塑全球货币体系。例如，亚投行给中国政府通过运营活动扩大其政治和经济影响范围的做法贴上了合法的标签，甚至让其可以巧妙地影响到金融领域的游戏规则。

亚投行是教科书式的典范，体现了中国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方面正变得越来越明智和老练。该做法突出了建设性合作，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运用自己的金融力量。中国政府正把这些机构作为国际经济外交的工具，取代了其早期的双边方法，因为双边方法运用不当甚至会导致融资接受国的不满。

中国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量，但不是如西方势力所希望的那样加入按照现有游戏规则运行的现有多边机构，而是自己制定规则，并且邀请其他国家加入到自己主导的体系中来。FD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 (ESWAR PRASAD) 是康奈尔大学庄臣商学院贸易政策南德拉尔·P. 托拉尼荣誉高级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本文摘自作者 2016 年的著作《获得普遍认可：人民币的崛起》(Gaining Currency: The Rise of the Renminbi)。

适应金融新技术（简称金融科技）的开拓者有望将金融行业稳步推入数字时代，正如同类似的开拓者彻底改变了通信、媒体和摄影业一样。

无论是选择住房贷款还是支付保单或者是公司支付从外国进口的原材料，消费者都可以获得更快速、更便宜并且更加可靠的服务，可谓是获益颇丰。新公司不断进入金融服务业，而现有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迫使其必须接受新技术，不然就只能走上被淘汰的道路。政策制定者如果要加强金融稳定，防止欺诈、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就必须调整现有的法规，或设计新的法规。

现在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金融科技的优势减少风险，同时不至于扼杀创新，这就需要国际合作。还有一些问题也值得考虑，但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金融科技对边远贫困地区获得金融服务的影响，以及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等。

金融科技包括各式各样的创新，如人工智能、生物识别、加密、云计算、分布式账本技术或区块链（它催生了虚拟货币，如比特币）。当然，技术已经对金融服务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批自动取款机安装于20世纪60年代末，而现在在可以使用高速互联网的地方，网上银行早已广泛普及。

但今天，变革的步伐似乎正在加快。其中一个原因是，最近技术本身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例如，IBM的报告显示，如今有90%的数据是在过去两年中产生的。2017年5月，一个人工智能程序在中国古代棋盘游戏——围棋对局中击败了一位中国高段棋手，此结果令很多相关观察者大跌眼镜。这些人曾经认为，目前距离最终决出人机胜负的时刻怎么也得几十年之久。

也许更重要的是，金融科技创新之间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此种技术的进步可以提高彼种技术的效果，进而打开应用金融科技的大门。例如，人工智能结合现有激增的大数据，可以使信用评级自动化，从而使根据消费者和企业借款人按时偿还贷款来制定相应贷款利率成为可能。所谓的智能合同，则得益于加密技术和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事先确定的市场条件，自动出售投资者的资产，从而提高市场效率。

投资者认为，这些新技术定都将取得成功。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对金融科技公司的投资总额从2010年的90亿美元飙升至2016年度的250亿美元以上。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年间，上市的金融科技公司的市场估值翻了两番，超过了所有金融行业的其他公司。与此同时，根据公众在线搜索关键词的频率，也能看出大众对于金融科技的浓厚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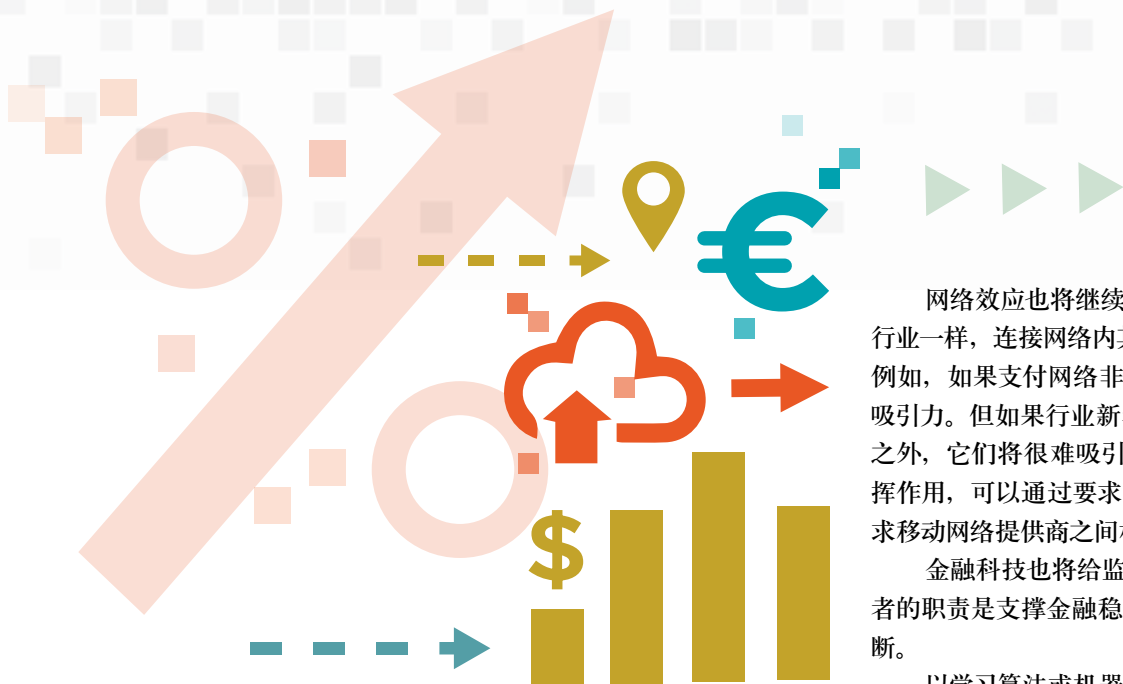
要了解新技术如何改变行业，首先要考虑的是金融机构为何而存在。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是中介机构，比如银行、银行间信息服务提供商和跨境交易清算和结算往来银行等。它们身处贷款人和储户等交易对手之间，促进交易的进行。它们提供有关交易对手方的信息，对其实施监管，并帮助分散交易的固定费用，包括信息技术成本和合规成本等。

金融科技创新之间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此种技术的进步可以提高彼种技术的效果。

新技术的出现可以降低对中介机构的需求。例如，监管者可获取标准化客户注册信息以及客户的数字身份，从而降低对客户尽职调查的成本。新技术还可以提供关于交易对手的更多信息，如刚才讲到的例子，因此可以形成量身打造而且更精确的信用评分。在这两种情况下，中介机构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而那些尚未被淘汰——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将持续存在——的机构很可能将不得不改变其组织方式。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拥有并能够访问客户数据。目前，大型金融机构为了能够获取客户信息（如客户信用和交易历史）而投入巨资。这些信息使金融机构能够更容易地为客户提供定制服务，不管是付款还是信贷，抑或是投资建议。从而，也鼓励银行采取能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一站式服务模式。





但是，新数据的数量及其所有者将改变这个模式。终端用户，不管是个人用户还是企业用户，都可以拥有这些他们在交易和商业活动中产生的数据。在此情况下，客户会更自由地在金融服务提供者以及金融服务消费者之间切换。另一种可能性是，新参与者会不断进入金融部门。社交媒体、大型在线零售商、在线娱乐公司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越来越多地控制了关于我们的习惯和偏好的数据，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我们的财富和交易历史。它们是会与现有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合作，还是承担一定风险直接进军金融领域？这着实很难预测，但是能获取并能拥有数据将会给它们带来显著的优势。

行业的准入壁垒也将不断演变。由于后台任务可实现自动化，包括发票对账等，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降低，这些都将成为鼓励行业新进入者的利好因素。

但金融行业依然偏好只有少数几个大公司存在的结构，尽管不一定非要是现行存在的那几家。因为信任至关重要；没有信任，客户永远也不会交出他们的财富、交易请求和个人数据。即使金融机构在面对网络、市场和算法的时候处于劣势，但客户仍然必须相信服务本身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然而，建立信任需要大量资金。在品牌识别、信息技术安全和稳定以及合规方面所需要的投资数额巨大，这倒是可以吓退部分潜在的参与者。

网络效应也将继续显现。在金融业，和其他行业一样，连接网络内其他成员的能力尤为重要。例如，如果支付网络非常普及，信用卡定将更具吸引力。但如果行业新参与者被排除在现有网络之外，它们将很难吸引客户。而监管可以出马发挥作用，可以通过要求网络之间相互渗透，如要求移动网络提供商之间相互渗透。

金融科技也将给监管者带来许多问题。监管者的职责是支撑金融稳定，保护消费者和防止垄断。

以学习算法或机器学习为例。依靠这些进行金融资产交易，可能会使投资者面临风险，因为所有买卖双方可能采取同样的行为，从而放大价格波动。他们也可能失败，或者遭到网络攻击损害。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可能破坏金融稳定。难道监管者必须得是软件工程师，必须会检查这些作为算法基础的计算机代码吗？

保护客户数据

保护客户数据则是另一大挑战。从理论上来说，生物识别技术等新技术可以通过用独特的人物特征（如指纹图像或视网膜扫描）来代替容易被盗用的密码，使个人数据更加安全。但这种方法也有新的风险：视网膜扫描如果扫描失败，将无法像密码泄露时那样，对密码进行更改。《华尔街日报》称，正是因此，花旗集团近期已经放弃了在ATM机上对客户身份进行生物识别的计划。然而，对新的安全方法的探索仍在继续。

当今年代有大量数据可用，所以这也要求我们在隐私和透明度之间保持平衡。这可能需要制定新的规则来保护消费者隐私免受网络攻击。监管者还必须有效防范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特别是当涉及虚拟货币时，因为虚拟货币本身就可以隐藏交易各方的身份。同时也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哪些数据可以用于定制金融服务，又如何定制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可以让居住在较贫穷社区的人、买酒喝或者听“不良”音乐的人支付较高的

抵押贷款利率吗？这不会加剧不平等程度吗？

苹果等公司也相继进入金融科技市场，这模糊了金融服务提供商的传统定义。监管者可能需要重点关注活动本质，而不只是看机构性质，例如银行和经纪公司。但是，如果相关实体演变速度太快，监管活动开展起来也很困难。监管者应该关注哪些公司，重点检查其商业行为？还是只需要等待有用户投诉，才去了解新的相关机构？又是否应该发明新技术来帮助提高自动评估在线活动和服务产品的质量呢？

最后一点，即使精心设计的国内监管制度也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发挥作用。技术无边界；许多服务可以轻松地迁移到监管较少的地区。如果国家监管框架之间能更加协调，这将有助于平衡竞争环境，并促进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以采纳接受。

IMF最近一项名为“金融科技和金融服务：初步注意事项”的研究仔细研究了跨境支付这一活动。跨境汇款非常繁琐而且成本高昂，因而这注定是一个即将崩塌的领域。这些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有技术的局限性。没有国际中央银行，大多数付款活动由私人代理银行进行清算和结算，这些银行会承担相应费用，但也因获得巨大市场支配力而获益。一些金融科技公司也正在向此领域进军；例如，据路透社报道，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已经获得一个泛欧银行牌照，可以直接为其企业客户处理跨境付款，而不需要经过银行。

虚拟货币可能对市场结构和监管产生最大的影响。这些虚拟货币以独一无二的数字串代替了敏感的个人数据。银行不必再通过繁琐的簿记系统来完成电子交易，从而降低了身份验证、账户、流动性和风险管理以及清算和结算服务的成本。

目前，现金是这个昂贵系统的唯一替代方案，但是现金容易损耗或被盗，这个危险抵消了其简洁性带来的优势。虚拟货币的引入可能逐渐改变这一点，它可以轻松、安全地在任何距离内进行传输。虚拟货币可由私人机构甚至中央银行发行（这将使其成为数字货币，而不仅仅是虚拟货币）。当交换虚拟货币时，交易通过网络进行验证，同

时在网络中进行广播，相关各方的信息则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在内。支付标记消除了双重支出的可能性（不向一方报告付款，以相同的资金支付另一方），并加强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即使精心设计的国内监管制度也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发挥作用。

用于虚拟货币交换的网络可以让人通过按下按钮就绕过大型商业银行，并消除银行之间单独进行消息传递服务的需求。正如电子邮件的出现消除了国内函件和国际函件之间的区别一样，使用虚拟货币可以大大简化跨境付款流程。

但这样的网络可能永远都不会获得成功。信任问题是其中一个原因。用户能信任这些新的数字钱包提供商，将自己的毕生储蓄交付给它？虽然虚拟货币的转账和存储相对安全，但仍然面临遭受欺骗的风险，欺诈分子可能指示数字钱包进行交易，以中饱私囊。相对于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虚拟货币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稳定吗？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在不断探索新的解决方案，并且要知道的是，在保持货币稳定方面，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值得信赖。

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内，金融服务很可能进入一段尴尬的转型期，并且这段时期很可能很快就会被取代。FD

托马索·曼奇尼·格瑞夫里（TOMMASO MANCINI GRIFFOLI）是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处长，也是最近IMF工作人员讨论纪要“Fintech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nitial Considerations”的合著者，本文正是摘录于此文。

心怀使命的 反传统斗士

卡米拉·安德森采访李卡多·豪斯曼，他
其一生都在追求发现驱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拥有40多年的在政府、学术界和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经验的李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一直在探寻国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他喜欢把发展比作拼字游戏。“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可以放在一起的字母组成新单词的过程。这就是发展的方向。”他坐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那间阳光充足的办公室里如是解释道。

他说,这种对揭示推动发展的力量的热情贯穿他的职业生涯。“我从不认为我在做不同的职业。我认为我是在不同位置做同样的事情。”

突破限制

豪斯曼自2005年起担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2000年以来一直担任经济发展实践学教授。他利用在哈佛大学的这段时间,不断改进并提炼对经济增长和限制的思考,这些限制可能是一个国家发展面临的一个或两个最大的障碍。他直接与世界各地的政府密切合作,帮助他找出新的增长源。

他解释说,“让我尤为困扰的是,很多人都找不到真正有效的商业模型。我所知道的大部分国家都被束缚在它们偶然进入的一个行业中,而这个行业通常曾经改变了整个国家,包括咖啡、可可、石油或者旅游业等各种各样的行业。”

为探究这些选择背后的推动力,2005年豪斯曼与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经济学家丹尼·洛迪克(Dani Rodrik)和安德烈斯·贝拉斯科(Andrés Velasco)一起,研究了增长诊断学。其主要观点是,每个国家都可能遇到自己独特的限制条件,必须对此加以理解和应对。“他参与开创的增长诊断方法是一个实用的政策工具和艺术的组合,”兰特·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如是表示。普利切特是肯尼迪学院国际发展实践学教授,是豪斯曼的同事,也是朋友。

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工作是他多年前在委内瑞拉发起的对话的产物。“我第一次见到李卡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加拉加斯召开的一场关于外债的会议上,”罗德里克(Rodrick)回忆说。“他带着我在加拉加斯的街道上散步,并不停地谈论经济、机构和发展问题,一些我们完全做错的事情。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这家伙在说什么?之后,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他到底在干什么。多年

来,我经常跟我分享他的看法,我也从中受益匪浅。他在业内风格独特,能将作为决策者的务实触觉和作为学者对思想的追求结合起来。我把他带到肯尼迪学院是我最大的成就之一。”

事实上,增长诊断方法是豪斯曼对待经济学的一般方法:总是超越经济学理论去测试经济学理论跟现实情况的对立。“李卡多几十年如一日,全身心投入对实体经济的研究当中,政策制定不会让他分心,反而是他对经济学更新、更深刻理解的来源,”普利切特补充说道,“李卡多在追寻经济学事实方面很有天赋,即使在那些左派和右派教条主义都很容易引入歧途的问题上,他也能找到事实依据。”

不要害怕跨学科找寻新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豪斯曼对于正统金融经济理论没有多少耐心,也没有深入探究的兴趣。“我认为,好的经济学的推动力是尝试理解问题,承认问题”,他这样说道。“在大部分情况下,学院派经济学都是先有解决方案,再去找问题。”

豪斯曼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跨领域,积极实践用不同方法来解决困难问题。“他使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历史、哲学、心理学、物理学,甚至是分形几何学等工具来解决问题。他可以结合几个不同领域,将其优雅地综合起来,创建他自己独特的分析框架,”他曾经的学生杜伊古·古文(Duygu Güven)如是表示。杜伊古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研究员,目前在土耳其财政部工作。

有所不同

豪斯曼致力于寻找答案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委内瑞拉。他的父母都是二战时大屠杀的幸存者,在离开德国和比利时后,定居委内瑞拉。他们以生产皮包为生,但委内瑞拉服装工业在20世纪90年代时并不景气,服装厂商离开委内瑞拉去寻找更便宜的生产地。当时,他们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服装生意卖掉,那以后该怎么办?做服装生意是我们唯一的专长。”

父母的困境引发了豪斯曼开始反思人力资本在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我的想法是,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掌握了越来越多的、不同的生产能力,然后可以重新组合的过程,”他

这样说道。探索人力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原动力。

豪斯曼在康奈尔大学取得了工程学和应用物理学学士学位。但他很快放弃了物理和工程学，专攻社会科学。他说，“在委内瑞拉学习电子没多大意思，不如学习委内瑞拉的经济，因为电子处处都一样，而世界各地的经济则各不相同。”

在获得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豪斯曼回到委内瑞拉教授经济学。1984年，他成为几个政府部门的经济顾问。1992年，豪斯曼被任命为协调和规划部部长，同时成为委内瑞拉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1994年，他前往美国华盛顿特区，成为美泛开发银行的第一首席经济学家。

原罪与暗物质

在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六年里，豪斯曼仍然在继续思考委内瑞拉的经济，并在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内广泛分享。为什么经济会受到长期波动的影响？他与迈克尔·加文（Michael Gavin）、埃内斯托·塔尔维（Ernesto Talvi）和罗伯托·佩罗蒂（Roberto Perotti）一起，探究为什么财政政策似乎总是顺应经济周期：财政政策不但没有稳定经济周期，反而加剧了紧缩，扩大了繁荣。财政政策加剧经济周期的现象引导豪斯曼及其同事得出结论认为，一些国家采用亲周期性的财政政策是因为它们的借款能力也是顺应经济周期的：它们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可以进入市场，但在经济状况差的时候则不然。

豪斯曼和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创建了“原罪”这个词，用来描述一个国家无法从国外借入本国货币，只能借入外币（如美元）的情况。如果一国“有原罪”，则将造成外债积累。正如，发展中国家这样做，以刺激发展和经济增长，但这会导致在资产负债表上货币错配，如果其国家货币贬值，债务就会增加，从而导致经常违约。

豪斯曼关于原罪的理论受到过很多经济学家的挑战，如卡门·赖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戈夫（Kenneth Rogoff）。这些经济学家不认为货币错配会导致债务问题，他们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问题是“债务不耐”，也就是说，

没有能力处理发达经济体可以轻而易举地管理的同等债务水平。他们表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连连违约。

豪斯曼的物理学背景启发他想出了一个吸引人的术语“暗物质”，来解决国际金融统计中的一个难题：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其从外国资产当中获得的盈利超过其为外债支付的利息，这是怎么做到的？在他2005年的论文“美国及全球不平衡：暗物质能避免大爆炸吗？”当中，豪斯曼和费德里克·斯图尔泽纳格（Federico Sturzenegger，现任阿根廷央行行长）使用“暗物质”来描述无形资产，例如一些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其他出口的专有技术，这些可以产生大量收入来抵消美国外债支付的利息。在物理学中，暗物质只能通过它所产生的引力来观察。在国际金融统计中，它的存在只能通过它产生的收入来推断。

与原罪一样，暗物质假设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从华盛顿到波士顿

在泛美洲开发银行任职期间，豪斯曼也参与制定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也就是10条经济政策措施，后来其变成危机中经济体改革的标准，但是也广受批判。豪斯曼参与了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的研讨会，后者第一次在此描述华盛顿共识，并且他还为威廉姆森的书撰写了有关拉丁美洲的一章内容。他解释道，“在某种意义上，‘华盛顿共识’实际是一个拉丁美洲的共识，内容是关于拉丁美洲的一系列异常的不平衡问题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豪斯曼开始对这些政策是否能达到经济理论预期的效果越来越怀疑态度。虽然存在一定正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实施改革的国家比没有改革的国家表现要好一些，但到了90年代末，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蔓延到拉丁美洲，导致1998—2002年的经济增长倒退。

“这迫使我重新思考。也许增长背后的原因比我原先认为的要多得多，”他说。“我们开始研究阻碍经济发展的，但之前从未考虑到的其他事情。而这正是我搬到哈佛大学的原因。”

对答案的不断探寻引导豪斯曼提出了“经济复杂性”的概念。这个概念首次提出是在2007年7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很多经济学家将复杂性视为他对于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IMF研究部的克里斯·帕帕耶奥尔尤(Chris Papageorgiou)如是说。

豪斯曼在他的网站上表示：“生产复杂东西的秘密并不是雇佣聪明人，而是让很多拥有不同意见和互补技术的人参与其中。富裕的国家有更多的集体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来生产各种各样更复杂的产品。”他说，贫穷的国家只能制作几个“简单的产品”。

李卡多在追寻经济学事实方面很有天赋，即使在那些左派和右派教条主义很容易引入歧途的问题上，他也能找到事实依据。

利用哈佛大学强大的资源，以及跨学科领域的方法，从物理学、经济学、公共政策以及网络和计算机科学的专业背景知识着手，豪斯曼开始探究社会是如何让生产性知识融入社会当中。根据这项研究，豪斯曼撰写了《经济复杂性图册——绘制通向繁荣之路》(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Mapping Paths to Prosperity)。本书于2011年出版，试图衡量生产知识在每个国家的数量。

一切才刚刚开始。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增长实验室如今大部分工作都是围绕构建知识的复杂网络而开展的。增长实验室在2011年时最初只有两个成员，后来逐步发展为2017年的40个。团队里有数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编程工程师和计算机专家、高级视觉专家，以及沟通专家。这些专业人士帮助维护并开发这个意义重大且包罗万象的网络。

该工作的主体部分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在分析经济和提供政策建议上。很多国家也与国际发展中心有直接合作，包括阿尔巴尼亚、墨西哥、巴拿马和斯里兰卡政府。

可能有些讽刺的是，委内瑞拉这个出产了发展经济学大师的国家，最终却遭受了几十年里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

豪斯曼在描述国家状况时直言不讳。“对于委

内瑞拉的灾难性衰退，没有任何借口。这是政策失败导致的。这道理人人都懂。多重利率制度、缺乏财政管制、失衡、产权不确定性、松散的货币政策、价格管控，这些政策可以摧毁一个社会。这也是人尽皆知的道理。”

正因为他直言不讳的批判，委内瑞拉政府宣称委内瑞拉不再欢迎豪斯曼。但这并没有妨碍豪斯曼不断研究自己国家的事务，并建立了研究模型，着重关注如何帮助委内瑞拉走上恢复增长的正轨。

表现基因

豪斯曼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氛围中的魔力似乎也被带到了课堂上。实际上，跟其他优秀教师一样，他也是一个表演者。乍一看，他的三个子女的职业道路都跟他们的父亲完全不同：一个是博物馆馆长、一个是剧作家，另一个是喜剧演员，但本质上他们有个共同点：都具有表演天赋。

塞巴斯蒂安·布斯托斯(Sebastian Bustos)是李卡多曾经的学生，也是后来李卡多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同事，目前工作于布鲁金斯学会。他描述了豪斯曼的学生曾给予豪斯曼演员那样的终极称赞：鼓掌喝彩。“学期结束时，一切都即将落幕，你就开始明白我们讨论过所有的话题的深刻意义，通常课程结束时每个学生都会鼓掌，他们非常非常开心。”

帕帕耶奥尔尤想知道，李卡多下一步会去往哪里？“李卡多在金融行业格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他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未来之路充满期待。”[FD](#)

卡米拉·伦德·安德森(CAMILLA LUND ANDERSEN)是《金融与发展》的主编。

劳动者损失

劳动者从收入大蛋糕中能带回家的收入越来越少

劳动者的收入份额——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占全国收入的份额——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下降。与此同时，资本占收入的份额则出现增长。由于资本所有者大都集中于最富裕的家庭，因此资本占收入份额的增加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恶化。

其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因国家不同而不同。在发达经济体，约有一半的下降是由于科技的进步造成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很多职业走向自动化。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全球一体化——尤其是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则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全球一体化通过提高生产率、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使数百万人口脱离贫困，也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活动转向资本密集型。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常常被转移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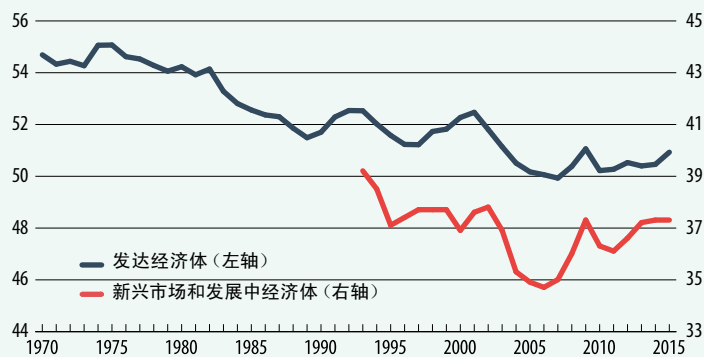
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对而言，同样的工作在那里更偏向资本密集型。如此的转移使得转出和转入经济体的资本份额都有所上升。

在新兴经济体，劳动份额的下降并不需要政策方面的干预，因为全球一体化的影响已使其受益匪浅。发达经济体面临来自科技进步的破坏，然而，对教育、技能升级以及政策的投入能够有助于让失业人员找到新的工作。促进更高技能发展方面的政策还能帮助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劳动者做好准备，以应对未来潜在的破坏。 **FD**

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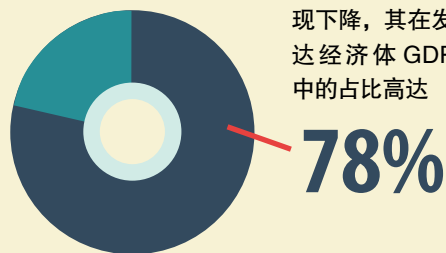
劳动者收入份额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下降。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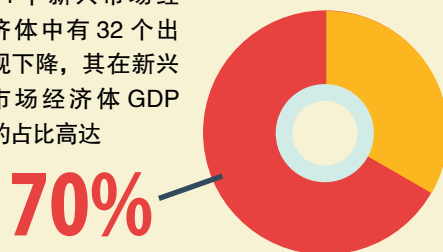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CEIE数据库；Karabarbounis和Neiman, 2014；各国当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1991—2014年，
劳动者份额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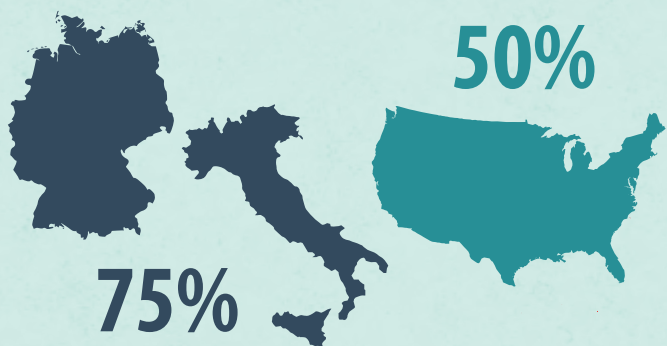


5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有32个出现下降，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GDP的占比高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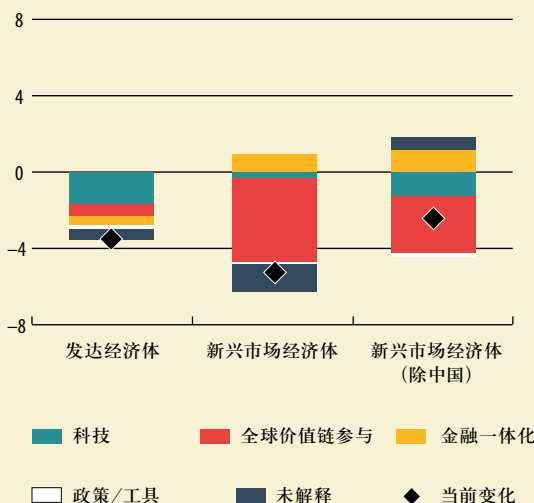
德国和意大利的劳动份额下降中约有**75%**归结于科技和全球一体化，而美国近**50%**的劳动份额下降是由此造成的。



不同的原因

造成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劳动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各不相同。

(回归常数偏离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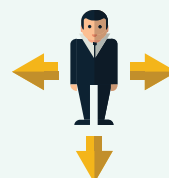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各国应如何应对？



加强教育



广泛分享发展成果



帮助劳动者提升技能



提供培训



确保平等地获得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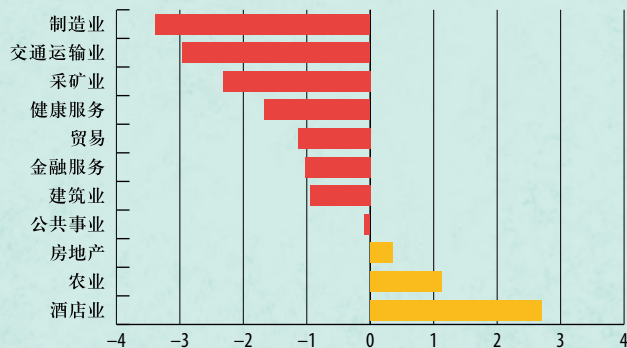


帮助寻找工作项目

发展的多样化

不同行业的劳动份额发展趋势大为不同。

(百分点/10年)



资料来源：CEIE数据库；Karabarbounis和Neiman, 2014；各国当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本文由玛利亚·约瓦诺维奇 (MARIA JOVANOVIĆ) 撰写。本文的内容和图表基于2017年4月IMF《世界经济展望》第3章。



照片: IMF

普惠金融的倡导者

本诺·恩杜卢论述为什么应该让更多人获得金融服务

本诺·恩杜卢 (BENNO NDULU) 是坦桑尼亚银行行长，也是向最贫困人口和最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倡导者。普惠金融联盟成员包括全球九十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作为该联盟董事会的现任主席，恩杜卢帮助推出了一些最具创意的政策方法，将金融系统推广到没有银行账户的群体。在他的领导下，坦桑尼亚银行批准设立了最初的两个信用记录局，以降低贷款风险，同时促进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并且支持将移动技术作为让更多人办理银行业务的途径。

恩杜卢拥有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经在世界银行东非局工作，并且帮助了非洲经

济研究联合会的发展，该联合会是一个泛非经济政策组织。

在接受《金融与发展》(以下简称 F&D) 的布鲁斯·爱德华兹 (Bruce Edwards) 采访中，恩杜卢指出，在每个公平的金融系统背后都有一个优秀的央行行长。

F&D: 最近，普惠金融倍受关注。央行行长要从何处切入普惠金融这个议题呢？

恩杜卢: 在非洲大陆内部，中央银行一直都是推动普惠金融事业的倡导者，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如果金融系统未涵盖大多数人口，那么你就不能实施有效的货币政策。所以，普惠金融——或者将没有银行账户的群体纳入金融系统中——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更多受政策影响的金融服务。

这是一个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减贫目标，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消除贫困，的确要求解决金融可得性的制约。金融部门基本上都是属于中央银行的影响范围。中央银行不仅负责制定货币政策，也监督银行，并且管理支付系统。因此，很多中央银行都将普惠金融加入到自己的职权中。

F&D: 在坦桑尼亚或更广泛的地区，哪些人获得金融服务的可能性最小？

恩杜卢: 首先是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可能处于普惠金融的最底层，或者说存在着最大的金融排斥性。其次是女性。普惠金融存在有城乡差距和性别差距，这两方面的差距都需要缩小。

F&D: 您是否认为东非地区的普惠金融人口统计因素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不同？

恩杜卢: 是的，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化习惯有关，在对女性理财方面的期待不同。在解决了提供金融服务平台的问题后，我们还必须解决文化习惯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F&D: 在您担任普惠金融联盟主席期间，您（或普惠金融联盟）对东非地区的决策者有多大的影响力？

恩杜卢: 普惠金融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是决策者的联盟。普惠金融联盟通过三种方式来影响其成员。

第一，同行学习。向同行学习他们的做法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是不可替代的。由于专注于普惠金融这一挑战，我们一直在与其他各地的同行开展相互学习，因为普惠金融联盟不只有非洲成员，还有亚洲和拉美成员，甚至还包括俄罗斯等一些国家。

第二，同行压力。我们做出集体承诺，并且总是报告实施这些承诺所取得的进步。成员们喜欢通过展示自己取得的进步来相互促进，但是这样往往也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压力。

第三，普惠金融联盟是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其中，私营部门和电信公司是关键参与者）进行协调的重要工具。最后，在普惠金融联盟内部，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因此，这是真正的相互学习，而不是被迫采取行动。这也使得普惠金融联盟变得非常特别。

F&D: 鉴于东非地区国家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和金融紧缩等，那么普惠金融的优先级别如何？

恩杜卢: 普惠金融的优先级别非常高，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都知道要想降低依赖性，国家需要真正地实现经济多元化，而中小企业通常能够帮助国家实现这一目标，但信贷可得性是中小企业遇到的主要障碍。现在，甚至农村地区都在追求多元化发展，他们不再全部从事农业。我认为，年轻人（即使是在农村地区）普遍愿意确保自己能够获得大宗商品以外的机会。因此，解决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金融工具的使用等主要约束非常重要。

F&D: 有趣的是，您如何将央行行长置于这个议题的中心，而我们在对普惠金融的讨论中很少听到央行行长的观点。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恩杜卢: 实际上，在你所提到的普惠金融联盟中，大多数关键成员都是央行行长及其同事，但是不同国家之间还是有差别。那些已经决定大胆接受创新（尤其是解决普惠金融挑战的数字化创新）的行长也往往会在普惠金融方面发表更多的言论。但是，也有一些更愿意采用传统方法的行长，他们表示“在确信没有风险前，我不会允许采用创

新方法。”因此，他们的行动非常迟缓。

F&D: 普惠金融或包容性政策是否存在政治风险？普惠金融是大受欢迎，还是为政治家所回避呢？

恩杜卢: 一般来说，我认为普惠金融是大受欢迎的。因为，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减轻焦虑，那就是包容性，而政治家都不喜欢焦虑。尤其是，既然本地区的青年是与失业和预期相关的重要因素，那么重要的是要通过包容性政策为所有人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谋生和远离麻烦。

F&D: 在您的祖国坦桑尼亚，您是否对自己在普惠金融方面取得的进步感到满意？

恩杜卢: 是的，我们在过去六七年中采用数字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独立后的头五十年中，我们只能将 9% 到 10% 的人口转移到正规部门，而在过去七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就将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比例提高到将近 60%。这部分得益于移动支付平台以及现在的数字身份证，因为这些技术可以确保人们能够申请信贷，并且让“了解你的顾客”（识别和验证银行顾客身份的程序）政策更容易执行。当然，我们也在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提高便利性方面取得了进步。这些都是坦桑尼亚等东非地区国家在普惠金融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重要因素。

F&D: 但是，金融科技往往都伴随着风险。监管者要如何管理金融部门，才能避免妨碍金融科技发挥其作用呢？

恩杜卢: 是的，风险总是存在的，而且必须对其进行管理。那些想要回避风险的人不会允许任何带有风险的创新来帮助他们，而那些做好充分准备管理风险的人则会在确保金融系统完整性的基础上使用创新方法。 **FD**

为更清楚地表达意思，本文对采访记录进行了编辑。



我们真得信任专家吗？

随着信息渠道的快速发展，专家的角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奈梅特·沙菲克

“为何没人注意到这一点？”2008年11月，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样询问该校的教师。

约十年后，随着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

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一系列不可预知事件的发生，大家也这样询问专家。公众对经济学家、民意调查者和专家的信心已经动摇。

不仅专家受到质疑，就连他们在观点上的垄断地位也被技术所削弱。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使公众能够在专家发表意见之前就获得大量信息，同时根据个人的喜好和兴趣推送针对性的新闻，并使人们越来越独立地选择自己想关注和信任的人。

专家为我们做了什么？

回顾巨蟒剧团的作品《万世魔星》（又名《布莱恩的一生》），该剧讲的是一个名为“犹太人民阵线（People's Front of Judea）”的团队组织了一次推翻罗马帝国的反抗行动。在他们的领袖雷哲（Reg）大喊“罗马人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之后，反抗者群情激昂，情绪达到高潮。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一位普通百姓小心翼翼地指出当地的水渠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然后，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细数罗马人带来的其他的有用的创造，直到最后雷哲不得不重新说明自己的问题：“除了卫生、医药、葡萄酒、公共秩序、灌溉、马路、淡水系统和公共健康之外，罗马人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们都需要专家。他们帮助我们应对疾病、减少贫困并改善人们的福祉。随着水资源变得更洁净，卫生和医疗保健服务变得更先进，人们的寿命比1950年时延长了约20年。随着经济政策的完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完善，世界平均收入提高了至少20倍。为了进一步推动发展，我们需要可靠的、受大众信任的专家。

但如今的专家已失去了以往的垄断地位。技术让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改变了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并影响人们形成观点的方式。根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有半数以上能够连接互联网的人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在美国，这个比例比2013年之前增长了一倍。

要想实现知识的数字化并随时获得知识，在

很大程度上需要普及知识并下放权力。人们可以找熟悉有关疾病及其他替代疗法的医生看病。群众可以提供对餐厅的评论，评估产品和服务，并提供针对一系列问题的新思路。数以千计的个人提供的“喜欢”与“不喜欢”以及评论可以建立信任。

但是，这样做也存在弊端：难以核实的信息会让人无所适从；不同的算法会在志趣相同、但从不转换视角的人士之间引起共鸣；虚假的新闻会扭曲事实；匿名的做法会赋予使那些可能会滥用职权的人获得权力；秉持点击率越高、收入越高这个观点会让发声最大者得到奖励，并宣传偏激的观点。

筛选信息并基于信息提供判断的专家只是众多声音中的一个，而且他们的语言难以被人理解，这常常使他们的声音很少得到关注。专家通常通过所获得的证书、行话的使用、对学术期刊的控制，以及影响对新专家的培训来使自己区别于非专家人士。这些界限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当前存在许多其他信息来源的情况下。英格兰银行雇员在最新发布的一篇博文中分析了该行各种刊物所用语言的复杂性，发现在五个人中只有一个能理解这类语言。

信任格局的不断变化同样也让专家陷于不利境地。2017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Edelman Trust Barometer)发现，在近2/3的国家中，不到50%的人口相信主流企业、政府、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能做正确的事情。现在，人们信任的是其他人。“像我这样的人”的可信度与学术或技术专家相当，并远高于首席执行官或政府——认为家人和朋友更值得信任，这在社交媒体上尤其明显。

重塑信任

牛津大学哲学家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认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提高可信度：通过对标准的立法、监管或指导——通常辅以确认合规的要求——或者通过让大家自己评估可信度的信息。但是，我们该如何重塑专家的可信度呢？

要简短，不能虚张声势：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曾说：“这个世界的全部问题在于，傻瓜和狂热分子总是对自己信心满满，而富有智慧的人却满怀疑问。”专家们一来不知道他们的模型是否得到正确使用，二来不确定他们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模型。从长期来看，坦诚自己的不确定能建立专家的可信度。对此，一个绝佳的例子就是英格兰银行采用扇形图进行预测。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央行也采用了这种做法：针对既定的初始情境，扇形图显示了一系列可能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预测一个结果。但是，传递不确定性会让信息更为复杂，而且无法在一个要求简洁的世界中获得大众的欢迎。例如，与其推送“如果与当前相似的经济形势得以延续，那么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最佳集体判断是，对GDP增速的成熟预测为：GDP增速有50%的可能性会超过2%，另有50%的可能性会低于2%”，还不如推送“英格兰银行预测增速将达到2%”，这样会容易得多——也更为有效，尽管前者能更准确地描述扇形图的真正意思。

简言之，专家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简短地进行交流，但不能虚张声势。

媒体的最佳实践：鉴于媒体在干涉民主国家中专家的观点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标准和好实践也至关重要。尽管这些标准和实践的确存在于多数的传统平面和广播媒体之中，但是互联网已经改变了行业的经济状况，催生了一批新的博主和伪新闻记者，他们有时并不遵守公平、准确和透明的标准。此外，在新闻发布方面，社交媒体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使消费者越来越难以区分合法新闻与其虚假变体。所有这些都解释为何2016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的研究会发现，有超过80%的國家的主流媒体已经失去了大众的信任。

假新闻的增多以及所谓的假均等——即在平等报告的名义之下，对可信和不太可信的信息源分配均等的时间——只是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在呈现相对立的观点方面，信息发行者和专家如何才能保持均衡的可靠性？

可以通过调整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标准和原则，扩大应用范围至全球智库、网站和媒体。同行评审、研究资金的竞争、发行数据的义务，以

及出版业利益冲突的透明度等业已成熟的原则管理着智力贡献这一重要方面。例如，智库应该公开报告自己的融资来源吗？如果记者和博主报告或传播虚假信息或谣言，是否应该被曝光？数字化平台是否应该为履行传播义务和保护自己的品牌，而为其所发布的内容担负更大的责任？

采用公共工具评估可信度：民众必须在信息爆炸时代区分事实和谣言。在线电子商务已开发出各种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他消费者的评估、其他评估者的可靠性反馈以及按时交货等绩效衡量标准。

在创意辈出的世界，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一些领域，传统机构已经能够满足这个需求。权威医疗网站为具有分辨力的病患提供可靠的信息，否则这些病患将不得不筛选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事实审核网站通过审核公众人物的说法，模仿学术界的同行评审，从而建立或质疑新闻和个人声明的可信度。国际事实审核网络的原则规范主要针对无党派人士、融资来源的透明度、方法论和基于事实的纠正情况。

专家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简短地进行交流，但不能虚张声势。

新机构正试图提高已被侵蚀的可信度。例如，在英国，致力于提倡银行业执行标准的英国议会银行标准委员会和为金融批发业务市场制定标准的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商品标准委员会，都在金融危机期间的不当行为丑闻爆发之后成立。高校必须教育学生成为具有分辨力的知识消费者，而公众意识活动能够改善媒体。在到处充斥着信息的世界，教育的未来将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判断能力，让他们成长为见多识广的公民。

技术官僚统治和民主制之间的界限：随着决策变得日益技术化，未经选举的专家正日益进入经选举产生官员的权限范围之内，此举给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当专家试图成为政治家时，问题就会出现，反之亦然。明确可以提升他们自己

的角色和责任至关重要。如果专家越界，就会破坏对其技能和专业责任的信任。而政治家一旦越界，就可能面临误导其支持者的风险，后者希望其能保障他们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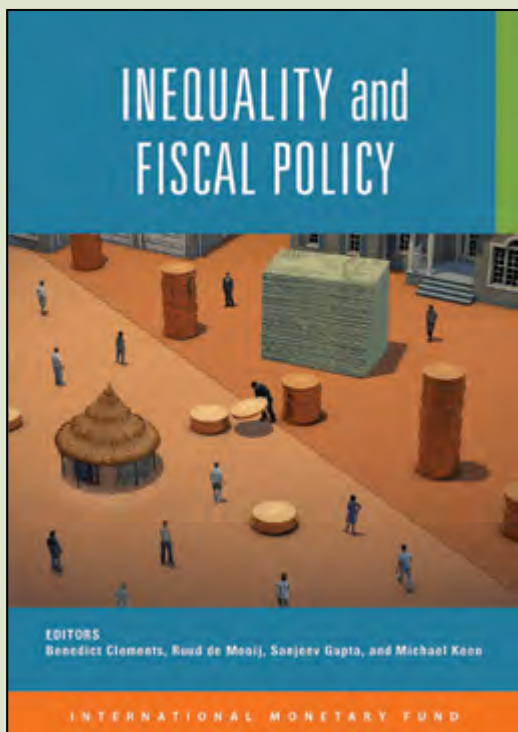
民事服务机构、央行和高校等独立机构在为了民众的利益而介入技术专长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但是技术官僚统治必须从民主制中获得权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决策需要技术输入，这就要求专家负起责任。一些批评家认为，财务审核、研究质量控制、流程和合规审核、环境影响评估、独立评价办公室、议会询问等活动代价高昂，鼓励大家规避风险，并分流重要工作的资源。但是，为了实现专家为民主决策提供建议的合法化，付出的这些代价是很小的。

基于知识的未来

通过媒体和机构提供教育并进行传播，从而实现知识的应用和积累是实现人类进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不通过专家来管理，而是如何确保专家的可信度。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真诚而谦卑地承认技能短板、清晰的沟通、严格评估信息、利用工具帮助公众区分不同的想法，并认真聆听他人的意见。

改善对专家和政治家的权限和责任的管理，将有助于维持技术官僚统治和民主制之间的平衡。如果我们能恰当地处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未来将由知识和基于信息的辩论所决定，而不是无知和狭隘。FD

奈梅特·沙菲克（NEMAT SHAFIK）即将出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一职。



《不平等与财政政策》

Benedict Clements、Ruud de Mooij、
Sanjeev Gupta 和 Michael Keen 编

“IMF 的政策能够对分配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不仅可以指导 IMF 自身的工作，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也非常有益，他们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对造成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各种不同的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政策的理解。”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在 bookstore.imf.org/fds17 上购买本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紧缩时期的 医疗卫生问题

当公共预算不能增加时，有针对性地降低税收
并提供补贴有助于提高民众福祉

拉玛南·拉斯梅纳理恩、伊恩·帕里



改善医疗卫生保健和增加健康人口数量可能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目标，但即使是增长快速的发展中经济体，也没有能力增加实际的医疗卫生保健支出，主要原因在于提高一般税收收入有一定难度。

这一限制意味着卫生部获得额外资金，那么其他政府部门或项目得到的资金就会减少——这在政治上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中要成为一个创举也不是不可能。

幸运的是，决定人口健康的许多关键因素——无论是否平等，其公民都认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不在于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而在于创新的税收和补贴改革可以带来更好的健康结果，同时又不需要大幅提高正式卫生项目的支出。

体系之外

正式卫生体系之外，决定健康的其他因素包括获得洁净的水和卫生设施；空气质量；提供和使用厕所、肥皂和安全套；社区的步行便利程度；烟草和酒使用率，以及包括糖和精粮等的营养的摄入。其中，许多因素可能会受到税收变化或补贴变化的影响。

例如，可以向损害健康的商品征税，补贴有益健康的商品。2012—2013年，印度给食物、肥料和石油这三种可能会对健康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大宗商品提供了总计520亿美元的补贴，2015—2016年提供了350亿美元补贴（见图）。2015—2016年的补贴金额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直接卫生支出的两倍。税收和关税可以改善一般人的

增进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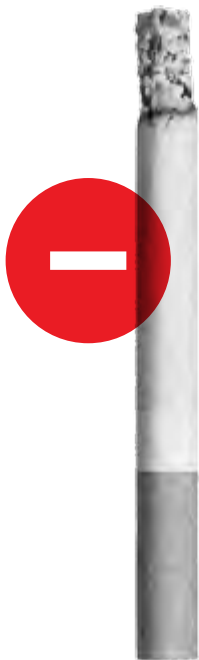
税收可以阻止不健康的结果，而补贴则鼓励有益的行为。

产品	风险因素	结果	改变风险的方法
烟草	吸烟、嚼烟	癌症、心脏病	税收
酒精	酒驾、危险性行为	交通事故、癌症、肝病、性传播感染	税收
避孕套	危险性行为	性传播感染	补贴
疫苗	麻疹、肺炎球菌病、其他可预防的疾病	传染性疾病	补贴
治疗传染性疾病的药物	缺乏治疗	艾滋病、肺结核、疟疾、细菌感染	补贴
肺结核快速诊断	缺乏诊断	肺结核	补贴
盐	高血压	中风	税收
含糖饮料	肥胖	癌症、心脏病、糖尿病	税收
粮食	肥胖	糖尿病	税收
反式脂肪	肥胖	心脏病、糖尿病	税收
柴油	空气污染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税收
液化石油气作为烹饪使用煤油的替代品	空气污染（开关可以减少污染）	肺结核、慢性阻塞性肺病	补贴

资料来源：作者汇编。



健康状况，比如向酒、烟草、食盐和糖类等会损害健康的商品征税。这样可能会减少糖类、柴油、煤油和煤炭等大宗商品的补贴，而节省的资金将流向有营养的食品和清洁能源。政府可以补贴液化天然气，使用液化天然气代替煤油用于烹饪，补贴有营养的水果、乳制品和蛋白质（见表）。



税收的教训

政府长期以来对烟草和酒征税，并总结了很多通过征税来影响健康行为的经验教训：

- 税收以及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必须产生实质性影响，才能达到预期的消费变化。因为对通货膨胀进行周期性调整，消费税才可能奏效。
- 各国政府必须通过堵住漏洞和防止走私及非法制造来防止国内和区域避税行为，因为大幅增加税收对于取得成效非常重要。在区域层面必须统一协调政策制定和执行，尤其是对烟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很容易被非法运输和进行交易。
- 如果只在一个地区征税，税收的设计必须考虑到相关产品的范围以及消费者可能会做出的

改变——例如，如果对含糖饮料征税而没有对含盐高脂肪零食征税，消费者可能会转而食用这些零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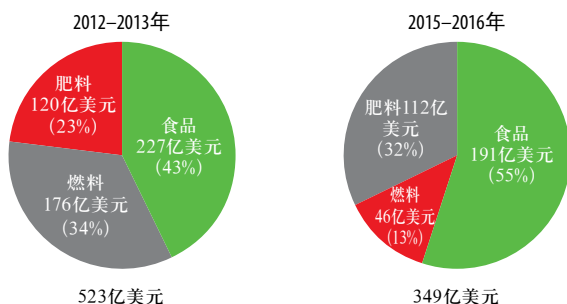
- 年轻人和低收入人群往往对不健康食品、饮料、烟草和酒的价格上涨反应最为强烈。
- 可以考虑将一部分收入分配给旨在改善营养状况、空气质量和推动积极生活方式以减少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发病率的资金补贴计划。

从经济角度来看，对烟草、酒和糖类征税不仅是为了解决滥用这些东西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而且还可以提高政府收入。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已经表明，最优的酒类税收入增加部分可能等同或超过滥用酒类的不利影响（Parry、West 和 Laxminarayan, 2009）。因此，财政方面的考虑可以显著加强对高额酒类税的支持。同样，给补贴重新定向可能会让一些面临其他税收限制的国家也有一定的支出喘息空间。

导致肥胖的食品——包括白面粉和白米等精制谷物——在许多国家得到了大力补贴。随着肥胖的增加，应该重新定位这些补贴，面向提高被补贴食物的营养成分。印度的豆类生产和消费（主要是干豆类）已经停滞不前，而粮食和糖类产量却在增加。在印度，根据 2013 年通过的《国家粮食安全法案》，政府预计每年将支出 250 亿美元来补贴粮食作物。这项补贴可以改善一些家庭的食品安全问题，而将这些资金用于豆类、水果、蔬菜和牛奶的公共补贴将对营养产生更大的有益影响。

发放补贴

2015—2016年，印度对食品、化肥和石油的补贴支出为350亿美元，远远超出国家和地方政府约180亿美元的直接卫生支出。（10亿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2012—2013年的燃料补贴包括对柴油的大量补贴，2014年10月柴油价格管制取消。柴油补贴占总燃料补贴的一半以上。2015—2016年，燃料补贴主要针对国内液化石油气（可重复填充的液化石油气为厨房燃料）和煤油。2012—2013年的汇率为55卢比兑1美元，2015—2016年的汇率为65卢比兑1美元。

清洁空气很重要

可能会有害健康的因素不仅仅包括消费者的饮食或吸烟，但这些影响可以通过税收或补贴来加以改变。几乎每个国家都对煤、汽油和柴油进行补贴——这些矿物燃料是颗粒物的主要生产，会导致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病、癌症和心脏病，并加剧了患肺结核的风险。根据 2015 年 IMF 的《全球能源补贴知多少？》这份工作报告，2015 年各国政府的能源补贴支出为 5.3 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 GDP 的 6.5%。而且许多国家

的能源补贴超过了公共卫生和教育支出，如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最近，补贴有所下降，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五年全球柴油价格下降引起的。重新分配燃料补贴，向清洁燃料倾斜，取消对污染最严重的燃料提供补贴，这将极大地改善人们的健康，同时缓解了资金短缺政府的压力。

倒推

有两种压力迫使政府使用税收和补贴作为实施卫生政策的工具。首先，取消补贴和征税通常被认为是反贫困的，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然而，烟草和酒带来的健康负担和经济负担对穷人的影响最大。在世界各地，心脏病和中风是导致大病支出的主要原因，而在印度等国家，这些支出是造成家庭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van Doorslaer 等人，2006）。

另一个顾虑是，取消农业补贴会损害农民和小型制造商的利益，包括那些生产名为比迪烟的廉价薄卷烟制造商。诚然，在许多国家，种植甘蔗和烟草的农民在经济上都很宽裕，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让他们破产，而是帮助他们过渡到种植不危害人类健康的作物。分配税收和调整补贴向改善健康的财政政策倾斜，可能会带来双重效益。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策制定者必须明确阐述增加税收和重新分配补贴的理由，并说明这些政策变化的赢家将如何得到补偿，确保他们的生计不会受到影响。

在世界各地，心脏病和中风是导致大病支出的主要原因。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必须应对日益增长的非传染性疾病负担，包括癌症和心脏病，还要同时保持对儿童疾病和传染病的警惕。随着国家的



发展，人口健康需求将会上升。通过利用经济激励措施来改变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各国可以在银行不倒闭的情况下实现显著的改善。FD

拉玛南·拉斯梅纳理恩（RAMANAN LAXMINARAYAN）是疾病动态、经济和政策中心主任。伊恩·帕里（IAN PARRY）是IMF 财政事务部首席环境财政政策专家。

参考文献：

Parry, Ian W. H., Sarah E. West, and Ramanan Laxminarayan. 2009. "Fiscal and Externality Rationales for Alcohol Policies."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9 (1).

van Doorslaer, Eddy, and others. 2006. "Effect of Payments for Health Care on Poverty Estimates in 11 Countries in Asia: An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 Data." *Lancet* 368 (9544): 1357–64.



风险与复杂性

全球一体化和新技术意味着快速的进步以及更高的风险

伊恩·戈尔丁、克里斯·柯塔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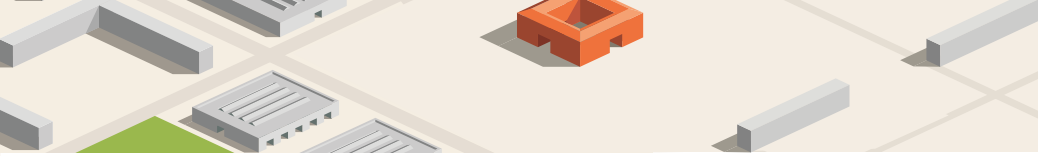
今天的经济体系和更多的思想传播结合起来，扩大了我们的选择范围，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并且促进了创意、创新和增长，但是也显著地改变了我们所面临风险的性质。

复杂系统的整合可能会导致意料之外和未知的结果，因为变化的速度意味着各经济体目前面临重大的新挑战，而国家治理体系和国际治理体系对此准备不足。

其中一个风险是与日俱增的复杂性，体现在全球航空旅行、跨境金融投资和互联网基础设施

等方面。而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放大了这种复杂性，因为流经不同连结点的流量不断上升，同时城市、工业园区、港口、计算机网络或物流枢纽、电站、实验室、会议和杂志等新节点也在不断增加。尽管通过规模经济以及消费者偏好或全球规则和法规（比如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法规）统一实现的全球一体化可能会降低复杂性，但是供应链的分散化、规则的激增、参与者和政府数量的增加超过了使之简单化的潜力。

然而，复杂性可能是有益的。因为连接点和



流量的更大的差异性和规模提供了加速创新的跳板，产生了更具活力和更分散的全球经济，并且提高了弹性。全球增长的多元化得到了提升并产生了更稳定的全球增长。虽然不断提高的贸易一体化可能会导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商业周期越来越同步，但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不断提高的差异性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贸易的增长又提高了弹性。此外，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内市场以及监管和监督能力的发展也能提高弹性。而且，系统设计、竞争和其他法规也可以提高复杂系统的弹性。在金融领域之外，例如，在互联网的一个连接中断的情况下，弹性可以确保其流量转向替代的连接。同样地，如果一台自动取款机发生故障，就可以使用另一台，只要替代品是由独立的企业或操作系统提供的即可。

业务的初衷可能在于分散并降低风险，但是在金融危机中没有人清楚地看到此类金融业务的系统性影响。其部分原因在于各国的监管者管理着跨越国境的系统。不过，即便是在各国境内，监管者也对此类金融业务缺乏清晰的认识。此外，计算能力的指数式增长也提供了将全新功能整合到金融产品（比如信用衍生品）的平台。而审计委员会和监管机构不了解这些风险，这反映了快速进化系统的代际和技能错配，因为机构和法规的更新缓慢，而技术及其在复杂系统中的应用变化则要快得多。因此，累积的连接性和发展性力量造就了比十年前大得多、也复杂得多的全球金融系统。这使得新的风险难以被发现，并且同时将风险扩散到更大的范围，波及全世界的劳动者、养老金者和企业。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不断提高的复杂性的风

我们在无法预见结果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做出好的决策？

但是，日益增长的复杂性给风险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为我们的相互作用变得越复杂，就越难以发现其中的因果关系。而且，我们在观察自己周围事件的过程中形成了认知盲点。我们在无法预见结果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做出好的决策？系统越复杂，则依存关系的范围就会更大，而一些依存关系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会显现出来。如果关联风险提高，则该系统中的每个要素或经济体的风险敞口也会变大，并且可能会在任一经济风险或其他风险出现时放大其影响。

谁之过？

从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长期后果就可以了解到归因问题的困难。很多专著以及知名学术期刊上数以百计的文章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而对金融危机原因的各种不同解释就反映了识别复杂系统中的因果关系越来越困难。

尽管衍生金融工具或货币互换等各种新金融

险其实非常明显。国家、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及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变得更高，彼此间的关联也更大。而金融工具变得更加复杂的主要原因是，在投资组合建立的过程中使用了性能越来越高的计算机。就像流行性病毒一样，不良债务在少数次级抵押贷款中产生，并且通过相互关联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散，最终威胁到全球金融系统。

金融部门杂乱的复杂性模糊了金融从业人员的视野，也没有多少私人或公共部门的企业察觉到累积的风险。正如作家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在2008年布隆伯格专栏中所评述的那样：“当公司崩溃时，[贝尔斯登的首席执行官]在打桥牌，[美林的首席执行官]在打高尔夫，这并非他们不在乎自己公司的崩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公司正在崩溃。”尽管IMF在其2007年4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性报告》中表示了对不断提高的风险的关切，但该组织的结论却是：“缺陷被限制在次贷市场的某些部分……不可能产生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投资银行进行的压力测试表



金融成为我们的新型相互依存关系的命脉，因此，对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的管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集中的风险

系统性风险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节点和网络的进化，即让某些节点在一体化的系统中起到主导作用，无论这些节点是物流中心、城市、机场枢纽、网络中心还是金融中心。越来越多的全球流量正在流经不断集中的地理区域。集中往往体现着规模经济的效益，也毫无疑问会带来显著的利益和效率。鉴于竞争政策的焦点在于机构的规模，因

明……通过证券化产品涉及次级抵押贷款的大多数投资者将不会遭受损失。”

越来越多的全球流量正在流经不断集中的地理区域。

在国家层面，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财政部是最强健的政府机构，拥有最好的人才、数据和分析能力，而且在很多国家，这些机构还承担着明确的金融稳定职能。在国际层面，IMF 和国际清算银行也是如此。但实际上，所有这些机构基本都对金融危机感到措手不及，这体现了 21 世纪新型风险（即系统性风险）的快速演化。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从风险的线性概念转向理解系统性风险。这意味着当系统的所有因素并行存在时，要综观全局，比如分析金融机构的累积与合并资产负债表。而且，我们需要跨越传统风险类别进行思考。在思考金融系统的未来风险时，我们必须敏锐地意识到，主要金融中心的流行病、网络攻击或极端天气事件都很有可能成为下一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像是引发 2007—2008 年金融危机因素的一个重现。虽然传统的线性风险并没有离去，火灾、盗窃、丑闻、关键员工流失等传统风险仍然可能会摧毁企业，但是在企业、经济体和系统之间越来越紧密的相互联系中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攀升得最快。鉴于

此在充满系统性风险的世界中，关键系统或者基础设施及人员的节点在地理上的集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个别地理中心容易受到一系列潜在灾难性事件的影响，包括流行病、天气（例如卡特里娜飓风或桑迪飓风）、恐怖主义、基础设施（例如网络中断或能源断供）等风险。任何全球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度越高，则与该地理中心相融合的全球系统就越容易受到与地点有关冲击风险的影响。

不断提高的集中度使得金融系统故障发生的可能性更高。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各个层面的集中度都有所提高。其中在企业层面，资本和资源集中在新型证券化抵押和债务产品上。在 2000 年前后，这些产品只是利基产品，而到危机爆发时，这些产品已经成为美国年销量第二大的资产支持证券类别，仅次于次级抵押贷款。

而且，当时行业内部的集中度也在提高。例如，从 1990 年到 2008 年，美国前三大银行的总市场份额从 10% 上升到 40%，为期初的四倍。而在 2008 年，英国前三大银行的总市场份额达到

80% (1997年为50%)。“太大而不能倒”就是当时公共话语中用来描述这些组织的短语。这些机构的高管知道自己的政府永远不会让他们破产，因为随之而引发的局面太混乱了。他们的投资行为逐渐失去了准则的约束——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道德风险”。最大的金融机构开始承担过多的风险，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事情严重偏离正轨，纳税人会拯救他们脱离困境。事实上，纳税人后来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此外，在经济体的整体层面，当时的集中度也在提高，因为蓬勃发展的金融部门占整体经济的份额比以前更大。例如，从1990年到金融危机爆发时，英国金融部门的规模占其GDP的比例从6%上升到将近10%，而且金融部门也占到伦敦总经济产出的1/5。

统一的市值计价会计准则（即基于当前市场定价对资产和负债按公允价格计量的会计准则）和监管标准在全球的采用既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在金融危机即将爆发前，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解除了对其国内金融行业的管制，这促进了信用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迅速被采用，从而导致金融杠杆的大幅提高。然而，这些金融工具的爆炸式增长与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所说的“单一作物”的发展很相似——就像之前的植物、动物和海洋一样，其抗病能力不断下降。霍尔丹时任英国央行负责金融稳定的执行董事，现任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

这些集中度都带来了真正的两难困境，因为每种集中度都要求我们用合法的私人目标换取知之甚少的公共风险。在资本流动性非常高且放松信贷能够取悦选民的情况下，哪位政治家能够经受住对抗解除管制趋势的压力呢？如果进入某新市场可以获得高额利润，那么哪个金融机构能够经受住远离该新市场的压力呢？哪个人不会受到只用很少的首付甚至零首付就能购买房屋或者坐等物业升值就能积累财富的诱惑呢？所有这些都提出了一个问题：谁之过？

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了这些两难困境的困难程度，在政治家和首席执行官们受到短期利益驱使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这些短期的激励措施会对为建立长期弹性和增长不断投入的辛苦付出造成

打击。而且，即使当时这些导致金融系统崩溃的风险得到了更广泛的理解，政治家是否会采取行动防范这些风险，仍然是未知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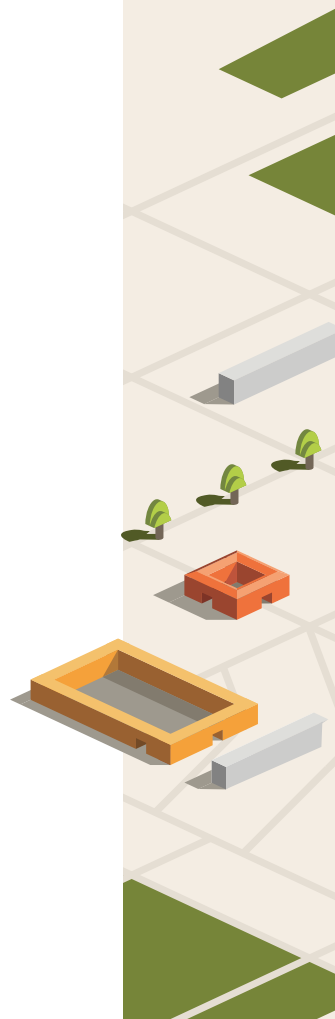
全球化需要合作

在过去三十年中，虽然全球市场一体化和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更快传播已经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进步，但这些前所未有的进步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包括不断提高的不平等和成功的负面效应所带来的风险，比如气候变化、抗生素抗性及其他环境和社会失调问题，以及革命性新技术和不断提高的复杂性带来的风险。

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在开全球化的倒车，而是通过紧密的合作来迎接我们共同的挑战。在金融领域，全球化（无论其好处如何）可能会带来集中风险，鉴于金融领域的快速创新，私人 and 公共部门都需要持续地学习新技能。这要求监管和监督机构要更加警觉，同时随着企业变得更加一体化，政策制定者要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而不断提高的整合程度也使得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

我们是否吸取了教训？历史是否会再度重演呢？**FD**

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是牛津大学全球化和发展学教授、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技术与经济变革项目负责人。克里斯·柯塔纳（CHRIS KUTARNA）与伊恩·戈尔丁是《发现的时代：应对新文艺复兴的风险及回报》一书的作者，该书也是本文的基础。另外，本文还参考了伊恩·戈尔丁与迈克·马瑞萨森（Mike Mariathasan）合著的《蝴蝶负效应：全球化带来的系统性的风险及对策》以及伊恩·戈尔丁所著的《追求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与理想》。



投资 促进发展

投资女性健康和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大卫·E.布卢姆、迈克尔·库恩、克劳斯·普雷特纳

投资于女性教育和健康以及关注女性就业机会和权利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回报。

然而，男女平等与全球标准相去甚远。在低收入国家，上学的女童比男童少（36%比45%）；尼日尔（17%）和南苏丹（7%）的女童入学率尤其糟糕。在所有人口和社会经济群体中，印度在女性健康方面的花费比男性要少（Saikia、Moradhvaj 和 Bora, 2016）。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女性在企业 and 政府中获得领导职位的机会更少。截至2016年，各国女性在议会所占的席位还不到1/4，目前只有15名女性担任国家元首（不包括名义上的首脑）。只有一半的劳动适龄女性处于正规就业，而劳动适龄男性的该比例达到3/4。

但卢旺达是一个明显的例外。1994年种族灭绝屠杀事件后，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

总统发起了一系列对女性有利的改革。性别权利现在被写入宪法。女性在议会占据了近2/3的席位，占中学注册人数的52.5%，占劳动力总数的54%，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也是世界上最小的。过去的20年，卢旺达在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显示，卢旺达在男女平等方面排名第五，仅次于冰岛、芬兰、挪威和瑞典，远远领先于加拿大（第35名）、美国（第45名）和澳大利亚（第46名）（但是，对待性别角色的传统态度在家庭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而且家庭暴力仍然是卢旺达各地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对女性的投资可能为卢旺达近期取得的经济方面的成功做出了贡献。2000年到2015年期间，卢旺达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一倍以上，远远超

女性， 展



照片: BUCKWINNELL / ALAMY STOCK PHOTO

健康的女性更有可能走出家庭外出工作，她们拥有体力劳动所需的体力和精力，而且工作时间也更长。

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其他国家的平均增长率。

这种性别与发展间的联系在其他国家也有体现。在世界各地，性别不平等程度（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性别不平等指数来衡量）最低的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要比性别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高得多（见表）。虽然难以完全证明性别平等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一观点是有说服力的，也符合事实（Diebolt 和 Perrin, 2013）。

性别平等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有效指标。因为繁荣带来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且为医疗卫生保健和教育提供了资金，而医疗卫生保健和教育又鼓励了劳动力参与，产生更高的生产率。此外，

经济保障也提高了家庭和自主权。

这种积极的动态变化可能会鼓励那些单纯靠时间来实现性别平等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风险：第一，该方法缺乏人权根据，因为对未来社会更公平正义的承诺忽视了那些今天受到伤害的人。第二，该方法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发展程度如何）能够实现完全的性别平等。第三，该方法忽视了性别平等能够帮助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事实，因为女性对经济的贡献规模很大并且能够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事实上，对女性的投资（尤其是在其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资）肯定能够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

公平的回报

各地区性别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比性别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拥有更高的人均收入。

性别不平等		
地区	GII最低的国家 (人均GNI)	GII最高的国家 (人均GNI)
阿拉伯国家	阿联酋 (67,330美元)	也门 (3,740美元)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新加坡 (79,660美元)	巴布亚新几内亚 (2,800美元)
欧洲和中亚地区	斯洛文尼亚 (30,360美元)	格鲁吉亚 (9,130美元)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智利 (21,470美元)	海地 (1,740美元)
南亚地区	不丹 (7,330美元)	阿富汗 (1,960美元)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卢旺达 (1,640美元)	尼日尔 (930美元)

资料来源：性别不平等数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14年性别不平等指数；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世界银行《2014年世界发展指标》。
注：GII是指性别不平等指数；GNI是指国民总收入。人均国民总收入以购买力平价（现值国际美元）表示。

促进经济

女性能够直接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做出贡献，其中最直接的途径是通过参加工作。女性参加工作可以促进生产，并且随之而来也会对家庭、社区和国家收入、储蓄、税收做出贡献，其贡献的大小取决于有多少女性参加了有偿工作、她们工作时间的长短以及她们的生产率高低，而生产率又取决于教育、培训和健康。

学术研究支持教育（尤其是对女性的教育）对于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受教育的女性可以享受更安全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工资就可以提高10%到20%）。而且，受教育女性的农业产量更高，她们（及其子女）的死亡率也更低。世界银行2014年的一份由克劳迪奥·蒙特内格罗（Claudio Montenegro）和哈里·帕特里诺斯（Harry Patrinos）撰写的报告发现，平均来说，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可使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分别提高11.7%和9.6%。这些结果与那些表明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不利的宏观经济学证据相一致。此外，正式



参与卢旺达基加利“女性互助”项目的女性正在进行缝纫作业。

和非正式的在职培训也会提高工人的技能和生产率。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上技术更依靠的是脑力而不是体力，因此教育和培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健康也很重要，对妇女来说尤其如此。健康的女性更有可能走出家庭外出工作，她们拥有体力劳动所需的体力和精力，而且工作的时间也更长。健康的女孩可以获得教育的所有回报，对未来的生产率和收入产生影响。因为教育鼓励女性对自己的健康投资，而良好的健康状况又会延长寿命，并拥有更好的认知能力和身体机能，从而提高教育的回报。

此外，提高女性获得资本、报酬和财产所有权的法律、体制和文化变革可以促进女性通过劳动做出直接的经济贡献。而且，能够支配自己收入的女性工作起来可能更努力，工作时间也更长。

另一方面，女性也可以通过无偿劳动对经济提供支持，尤其是在家庭中。她们生儿育女，并

往往自行或者按照社会的约定俗成承担着主要的养育儿女的责任。她们还照料家庭中的长辈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女性要取水、做饭、做其他家务，并且自愿参与社区事务。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15 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女性每天的工作时间分别比男性平均要多 30 分钟和 50 分钟。

女性也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间接的贡献。从长期来看，对女性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助于将社会从高生育率转变为低生育率，因为能够通过工作获得收入的女性在经济上没有生育很多子女的动机。调查显示，一般女性更喜欢拥有较少但受教育程度高和更健康的子女，而不是拥有数量多、受教育程度低和健康状况较差的子女。而在社会和家庭中拥有影响力的女性可以将这种偏好付诸实施。

这种生育率的变化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

的和长期的影响。随着生育率开始降低，青年抚养比也降低，因此，人均社会产出上升，出现了所谓“人口红利”的潜力：家庭的储蓄和投资上升，政府可以对那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项目投入更多的资金。生育率下降后的第一代儿童更健康，受教育程度也更高，因此也比他们的上一代人拥有更高的生产率。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善的人力资本会促进社会从高生育率、教育程度低和健康状况不佳的状态向低生育率、受教育程度高和健康状况良好的状态转变，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十年中，虽然各收入国家群体的生育率都出现了下降，但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生育率最低，在这些国家，生育率变化和经济影响更加显著。

女性健康状况及其在家庭中地位的改善可以影响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的健康、教育和幸福感。最新的研究发现，母亲的良好健康状况能够改善子女的认知发展、行为和学习成绩，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健康和生产率。而根据以前的研究，如果女性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比例更大，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家庭支出用于家庭成员的健康，这将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一项对科特迪瓦的研究表明，随着女性收入的提高，家庭往往会增加花在食品上的支出，并且减少在烟酒等有害商品方面的支出（Hoddinott 和 Haddad, 1995）。

母亲的良好健康状况能够改善子女的认知发展、行为和学习成绩。

女性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如果女性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受到良好的教育、获得充分的授权，她们就更有可能在社区中担任领导的角色。此外，对女性的教育还能够促进向民主社会的转型，从而对经济的长期繁荣产生积极影响。参加工作的受教育女性对非民主政体宣传的性别不平等的容忍度更低，而且可能会推动更加具有响应性的领导层的出现。参加工作还可

以让女性与家庭以外的人展开交流，以及组织政治行动。

对女性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可以产生良性循环，因为随着更多的女性开始工作，社会对女性参加工作的看法也会变得越来越积极。例如，由参加工作的母亲抚养长大的男性有可能更愿意分担家务劳动，从而让女性外出工作变得更容易，而且这些男性也更有可能会对女性参加有偿工作持积极的态度（Fernández、Fogli 和 Olivetti, 2004）。

让理想变成现实

愿意对女性投资和改进经济绩效的国家有很多可选的政策。很明显，加大教育和医疗投入就是其中之一。

教育非常关键。学费的下降以及针对学生入学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都有助于让家庭认识到送女孩上学是负担得起的。此外，中学里的自来水、冲水厕所和卫生用品也可以吸引女孩上学，而建设更多的学校来减少上学出行时间也能鼓励女孩上学。

除了为普通医疗卫生保健提供资金之外，对女性生殖健康的支持也能产生长远的经济效益。例如，对计划生育的投资（如提供优质避孕用品）

和实施晚婚政策（如禁止童婚的法律）都可以帮助降低生育率。

尽管本文列举的具体可选政策主要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但高收入国家也能通过采取干预措施来促进和鼓励女性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尤其是担任领导职位），并从中受益。在各收入国家群体中，改进公平的努力是最有可能产生效益的，但这些努力应该与培育高效的劳动力及资本市场以及提

供基本劳动保护的一般宏观经济政策一同实施。

经济理由

综合来看，健康、教育、授权赋能和经济福祉形成了良性循环。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本身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而且二者结合起来的效果非常显著。这对于女性和男性而言均是如此。但是，如果健康状况不佳可能会让女性陷入教育程度低的恶性循环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投资，其效果会令人震惊。

虽然人力资本是各国最大的资产之一，但是必须对人力资本进行良好的管理，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女性的经济贡献，无论是在有偿劳动或无偿劳动方面，是以较小的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子女还是更稳定的社会等形式来体现，都能够改变经济成果。因此，对女性的投资不只是应该做的正确事情，也是可产生经济效益的明智之举。FD

大卫·E.布卢姆 (DAVID E. BLOOM) 是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与人口系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教授。迈克尔·库恩 (MICHAEL KUHN) 是维特根斯坦中心和维也纳人口统计学研究所人口经济学研究小组的共同负责人。克劳斯·普雷特纳 (KLAUS PRETTNER) 是霍恩海姆大学经济研究所增长与分配部门负责人。

参考文献：

Diebolt, C., and F. Perrin. 2013. "From Stagnation to Sustained Growth: The Role of Female Empower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 (3): 545–49.

Fernández, R., A. Fogli, and C. Olivetti. 2004. "Mothers and Sons: Preference Formation and Female Labor Force Dyna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 (4): 1249–99.

Hoddinott, J., and L. Haddad. 1995. "Does Female Income Share Influence Household Expenditures? Evidence from Côte d'Ivoire."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7 (1): 77–96.

Saikia, N., Moradhvaj, and J. K. Bora. 2016. "Gender Difference in Health-Care Expenditure: Evidence from India Human Development Survey." *PLoS ONE* 11 (7).

《金融日记：美国人如何应对充满不确定世界》

Jonathan Morduch 和 Rachel Schnei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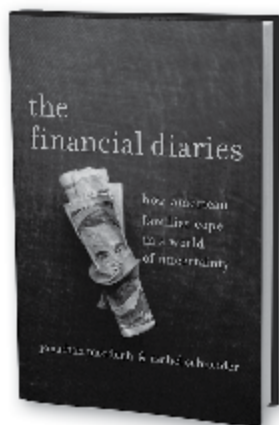
“《金融日记》是理解工薪阶层家庭对其金融情况感到不满的原因的重要的框架。它列举了区分流动性不足和破产之间区别的重要例子，以及为什么其应对的政策方案有所不同。”

——Elisabeth Jacobs, 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

“《金融日记》达到了最罕见的目的：让人在思考问题时并同时关注问题。这是一本极具价值的书，带领我们深入探究这个时代的经济不确定。”

——Jacob S. Hacker, 《The Great Risk Shift》一书的作者

精装, 27.95 美元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登录 press.princeton.edu 查看电子书



创建市场

创建新市场对于增加私人投资和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莫滕·吕克·劳里森、洛里安·莫尔德斯

几十年来，拥堵又破烂的公路妨碍了哥伦比亚的经济增长。2016年，在和平协议终结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武装冲突之后，哥伦比亚政府非常希望通过基础设施（尤其是新公路）建设，为该国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但是，他们也认识到，一次上马一个公路项目可能远远达不到自己所寻求的经济促进作用。相反，他们需要市场，其中之一是私营公路建设市场，另一个市场则要将储蓄转化为长期贷款，从而为这些公路项目提供资金。

而面临关键的挑战在于建立起能够吸引大型投资者（其中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对当时仍然属于未知领域的项目进行投资的框架。因此，创建能够吸引这些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对于解决哥伦比亚的基础设施短缺问题非常关键。

因此，国际金融公司（IFC）、哥伦比亚政府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设立了一家新金融机构，来解决妨碍基础设施融资的市场失灵问题。哥伦比亚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投资友好型措施，比如担保和项目支持，并且制定了新的资本市场法规，以方便养老基金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2016年1月，一家为大型项目融资的大型基础设施债务基金成立。

因此，哥伦比亚将获得数千公里的新公路，这能极大地促进该国经济的发展，而投资者能获得一系列的新商业机会。

类似哥伦比亚公路短缺的这种情况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并不鲜见，但哥伦比亚所采用的方法

却提供了一个范例——国家如何为私人投资者提供机会。发展中经济体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资金预计为每年4万亿美元，而私人投资者的参与对于筹集这些资金非常关键。

按照当前的融资趋势，如果不能动员更多的私人资本参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可能会远远落后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那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府和开发金融机构要如何创建市场来吸引私人投资呢？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充分理解市场的组成要素及其关键特征。

创建框架

所有的市场都有几个共同的组成要素。按照经济理论，想要创建市场的政府应该专注在能够培育新技术、制定更好的制度以及拥有更丰富的思想和人力资本的行动上。此外，政府还能通过支持性激励措施和法规来建立新市场的框架。

例如，在印度，政府激励措施的新框架和新的项目投标结构，就帮助甘地讷格尔的一个太阳能电网项目吸引到了私人投资者。该项目的成功经验目前正被复制到五个其他城市。在乌克兰，符合欧盟规则的新食品安全法律和行业法规的实施对于农业市场的现代化和促进进出口非常关键。

从这些例子中学到的一个关键经验就是，开发机构要发挥核心作用，在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

建立桥梁，从而实现这些积极的市场变革。

在创建市场的战略中，关键是要清晰阐明市场在一段时期之内应如何发展，因为可持续的市场很少会是偶发事件和幸运的产物。

要想成功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贡献，新创建的市场应该是：

- **可扩展的**：市场应该影响到大量的人并且让他们受益，而且最终要涵盖那些初始投资目标之外的人。

- **可持续的**：在市场开发方面付出的努力应该促进系统性的市场变革，而且这些变革在政府或开发金融机构的投资结束后能够坚持下去，不会对政府带来不可持续的财政负担。此外，市场在环境和社会方面也应该是可持续的。

- **有弹性的**：市场参与者应该改变模式和制度，使它们即使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继续提供产品和服务。

而且，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市场应该具有包容性，并且为贫困人口服务。例如，在孟加拉国，国际金融公司和其他开发银行对移动金融服务公司 bKash 的投资就是一个早期市场创建的例子。该公司在上述投资完成后快速发展，帮助将数百万没有银行账户的贫困人口纳入到正式的金融系统中，而这些贫困人口以前主要用现金交易，努力为未来省钱。

市场创建的渠道

在创建市场的过程中，下列四个渠道非常重要：

- **建立平台，实施改革，让市场实现正常运转**。实现能源和农业等部门的政策变革，消除私人投资者的客观和主观障碍，让他们进入这些市场。这方面的责任主要由政府承担，但开发金融机构通常也应提供建议和帮助。

- **促进竞争，促使其他市场参与者改进经营**。例如，对能够改善服务和降低价格的新零售模式投资，会迫使该市场上的竞争者通过实施类似的业务改进来适应这一局面。

- **展示成功，促进创意的传播**。成功会引发模仿，这是示范效应的核心逻辑。例如，一种能

够吸引资本和展示市场可行性的新债券结构将会鼓励其他私营机构提供类似债券。换言之，鼓励跟风者。

- **建设开发新市场机会的技能**。例如，培训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者和促进对金融机构的投资能够创建对冲产品市场，而对冲产品是能够帮助企业客户管理金融风险的金融工具。

通过触发与初始投资没有直接联系的部门和人群的市场活动，所有这些渠道都能够促进市场变革，并且会超过特定开发项目或投资的直接效果。

对于国际金融公司等开发金融机构来说，其挑战在于如何将市场作为运营商业模式的核心，而不是采用传统的重视单个投资的方法。这要求转变思维方式，从追求一次性交易转变为寻求通过多项投资综合起来形成较大的发展影响。同时，必须重视对环境、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影响，以确保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为了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金融公司正在推出一个新分析框架，用于评估新投资和咨询工作的预期发展影响，其中包括评估市场创建项目的动态效果。这个重要的框架将帮助国际金融公司的员工系统地评估和更好地预计项目和投资的市场影响。此外，通过专注于创建市场，该框架还能帮助国际金融公司在困难的环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困难的环境包括脆弱和饱受冲突破坏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私人投资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非常关键。FD

莫滕·吕克·劳里森 (MORTEN LYKKE LAURIDSEN) 是国际金融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弗洛里安·莫尔德斯 (FLORIAN MÓLDERS) 是该机构的运营官，受经济与私营部门发展的副总裁领导。

有效的脱贫方法

如今，世界经济面临着多重挑战。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渺茫；由于石油等大宗商品出口价格低迷、债务水平再度居高不下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缺口越来越大，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纷纷感到处境艰难。而且，来自收入极化、气候变化和工作机械化的威胁，也在持续考验着政策制定者让其民众实现经济保障梦想的能力。对于贫困群体来说，困难尤其真实，因为即使是在年景好的时候，贫困人口也还是不受关注的群体。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里消除贫困一直是全球面临的迫切问题，但实现这一目标非常困难。虽然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的强劲经济增长帮助

环。她还认为，直接向贫困人口提供工作比提供政府救助更有效，因为政府救助可能会出现分配不当或者浪费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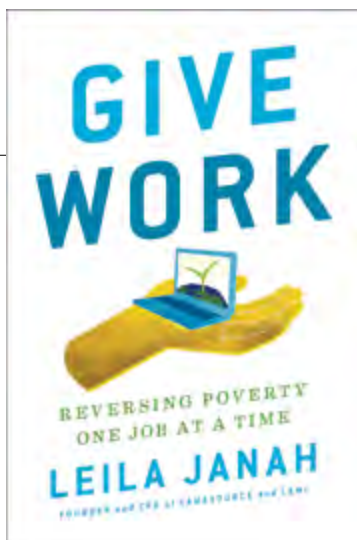
尽管贾纳的观点并不一定新鲜，但本书因提供了很多证据而引人入胜。本书讲述了作者在创立 Samasource 前需要克服的种种挑战，这些挑战中包括找到能够承担大公司外包工作的贫困人口，并且对他们进行培训。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需要韧性、学习和坚持，并且制定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下都适用的商业模式。今天，Samasource 已经使海地、印度和肯尼亚等国以及美国农村地区约 35000 名世界最贫困人口的生活得到了改变。

本书强调了数字连接对于当今就业的积极潜力——例如，对贫困人口进行培训并向他们提供能够验证搜索引擎基础数据的数字化工作。同时，本书也承认，鉴于技术的快速变化，这些解决方案将来可能会无效，因此需要持续改进。但是，本书提供了一个有效地改变贫困人口生活的典型案例，通过很多社会企业的共同努力，一次提供一份工作，让一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然而，贾纳过于草率地否定了解决脱贫问题的替代性方案。她应该表现出更大的同理心，认识到各种不同实体（包括营利性实体或类似 Samasource 的非营利组织、公共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在支持产生可以影响贫困人口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一些实体强调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让他们能够对脱贫提供更大的支持，而另一些实体则直接瞄准就业创造，把有利的环境当作前提。

鉴于脱贫工作极具挑战性，必须采取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对这些脱贫方法更深刻的认知——以及对需要激发各个组织积极参与扶贫工作予以更多的重视——将会帮助贾纳避免在一些观点上的辩解式论调。FD

鲁帕·达塔古普塔（RUPA DUTTAGUPTA）是 IMF 战略、政策与检查部处长。



莱拉·贾纳
《提供工作：
通过逐一就业实现脱贫》
企鹅兰登书屋，纽约，2017年，
272页，27美元

数以百万计的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但历史也表明，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并不是总能实现脱贫。实际上，全球有约 7 亿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莱拉·贾纳（Leila Janah）所著的《提供工作》（Giving Work）一书从社会企业家的立场提供了解决贫困问题的新观点。贾纳是非营利性组织 Samasource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该组织将贫困人口与数字化工作联系起来。贾纳认为，脱贫需要为贫困人口创造生产性就业，帮助其打破一旦陷入就难以摆脱的绝望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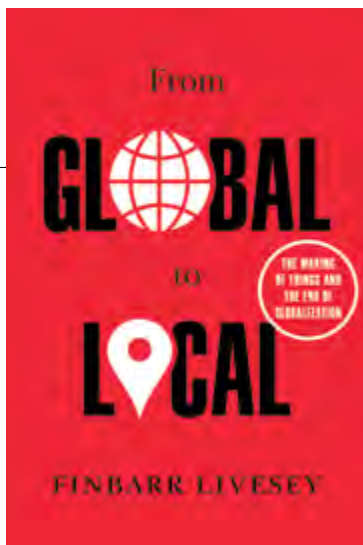
全球化面临终结？ 也许是， 也许不是

剑桥大学讲师芬巴尔·利夫西 (Finbarr Livesey) 在其所著的《从全球化到本地化》中指出，技术变革、消费者偏好、环境挑战和民族主义正在推动全球化时代向本地化时代转变。如果忽略其副标题，本书还是谨慎的，认为全球商品贸易增长将会减速，但不会停止，因为企业要将生产基地建在靠近顾客的地方。

这一论点有四大依据。第一，加法制造和3D打印技术让本地化生产成为可能，而这种本地化生产的资本（机器人）密集程度更高，而不是依靠传统的规模经济。第二，中国的高工资让境外生产的吸引力下降。第三，消费者希望定制产品能够更快交货，而且全球运输成本受到碳排放限制的制约。第四，民族主义正在推动贸易、税收和监管政策对境外生产进行抵制。

利夫西预计，国际贸易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增速将会放缓，从而逆转全球化趋势。先进制造业将降低甚至消除固定成本及规模经济，让多用途的小规模工厂可以服务本地顾客。同时，全球范围的资源差异正在缩小：生产越来越集中在可移动的智能机器上，比如3D打印机和机器人，而且中国的快速资本积累已经极大地缩小了中国与欧洲及美国之间的资本劳动比率差异。此外，根据利夫西对运输成本和当今民族主义政治的观察，他认为贸易占收入的比例将会减小。

这也许是对的，也许不对。因为生产的固定成本不仅取决于机器人和3D打印机，还取决于专业知识、知识产权、附近的互补性自然资源等因素。因此，我对专业化会消失的观点表示怀疑。而且，国家的资源可用性也取决于资本劳动比率以外的更多因素：气候、水资源、再生能源、免受自然灾害侵袭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质等。例如，技术进步更可能会扩大，而不是取代全球旅游。此外，很多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将会继续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服务，比如建筑等。



芬巴尔·利夫西

《从全球化到本地化：
商品产地的转移与全球
化的终结》

Profile Books, 伦敦, 2017年,
224页, 26.95美元

而且，运输成本的降低也会如同其上升一样容易。例如，扩大的从亚洲到欧洲的极地航线就会降低运输成本。另外，改进的物流和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将减轻贸易的压力，而航运和航空技术的进步也可能会以相对较低的成本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民族主义虽然是真正的威胁，但却不是决定性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全球化的推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也会与欧洲和美国的民族主义观点至少有着同等的影响力。

部分挑战在于更准确地定义“全球化”。虽然一些制成品贸易的增长可能会减速，但是一些有着重要但较小环境影响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增长可能会加速，比如食品与饲料、非食品农业、可再生能源、旅游等，而知识产权和金融服务（包括对低收入国家的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和制造设施的租赁）的贸易也可能会增长。

利夫西的这本书的最大优点是，让我们更仔细和更明智地观察全球化的基本驱动因素。未来几年的全球化肯定或多或少会与以前不同，而本书将会帮助我们理解和预测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变化的动态。FD

杰弗里·D. 萨克斯 (JEFFREY D. SACHS) 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的负责人。

诱人的纸币

最近重新设计的面额为50欧元的纸币是欧洲最常使用的货币

埃斯特·巴拉日

对于很多人来说，在欧元区，一张面额为50欧元的纸币能买到以下这些东西：一小盒比利时巧克力松露、一瓶香槟酒和一些鲜花；或者一打比利时啤酒；或者一盒20条大炸薯条。50欧元是欧洲人最常用的货币，超过了其他面额的货币总和。最近，这一在欧元区使用最广泛的钞票得到了重新设计，以使其更具吸引力，并且更加安全。

我们喜欢欧元现金

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使用欧元作为法定货币，淘汰了边境货币兑换点。先不说由

此产生的经济影响，19个欧元区国家的3.38亿居民因此而享受了统一货币带来的便利。最近的欧盟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这对于自己国家和整个欧盟而言是一件好事（其比例分别为57%和69%）。

90亿张面额为50欧元的货币在流通（占有欧元货币的46%），欧洲人喜欢用其来结账，而不是使用信用卡。“即使身处现在这个数字时代，现金仍然是我们经济中的必需品，”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2017年4月新设计的面额为50欧元的纸币推出时这样说道。“欧元区销售点的所有结算支付中有3/4使用的是现金，”他说。

货币伪造者也喜欢欧元现金

老的橙黄色50欧元面额的纸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货币伪造者也对其钟爱有加。根据“市场”网站（Marketplace）的资料，其与面额分别为20美元、50元人民币以及印度最近正在回收的500卢比的纸币一起，“荣获”全球最受货币伪造者喜爱的纸币。这也是欧洲央行决定要对其进行重新设计的原因之一，这次设计包括其他所有面额的纸币，统一使用欧罗巴元素进行设计。

新的50欧元面额的纸币由位于柏林的邮票设计师莱茵霍尔德·格斯特德（Reinhold Gerstetter）负责设计，采用一般通用的文艺复兴建筑图形，避免了使用某个特定成员国的建筑风格。此外，该新版货币还采用了一系列防伪技术，包括一个全息透明窗户以及翠绿色的能够变换颜色的数字，央行希望以此能防止货币造假。

专家对于全息技术和变换颜色等安全防伪技术非常感兴趣，但普通大众却对此漠不关心，神经系统科学家如是说。

“他们把大量的精力用于纸币的防伪技术上，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欧罗巴的肖像出现在纸币的透明窗户上，而这一窗户的设计是该纸币的安全防伪特征之一。



面额为50欧元的纸币是欧元区使用最广的货币，以下是该纸币的正面和反面图。



但问题是以前从来没有人使用过这些技术。欧洲央行最终决定采用另一种方法，一个更偏向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方法。”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大卫·易格曼 (David Eagleman) 这样告诉我们，他也是该欧罗巴系列设计的顾问。“我发现，相比建筑图案是否被完美地描绘而言，人们会在第一时间发现自己熟悉的脸庞没有被很好地描绘出来。作为人类，进化使得我们拥有超强的能力来进行人脸识别。当见到自己的朋友时，你会很快发现他或者她脸上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对于货币上那些人们熟悉的脸庞而言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也是为什么人脸会首次出现在欧元纸币上面的原因。纸币上那个长着一头小卷发的女性就是欧罗巴，她是希腊神话中复杂而高贵的腓尼基公主，被众神之王宙斯引诱，欧洲便是以她的名字来命名的。

这个多彩的、安全性更高的新版50欧元纸币只是欧罗巴系列中的一种，新版5欧元、10欧元和20欧元纸币随后被相继推出。此外，面额为100欧元和200欧元的纸币预计将在2019年年初时推出。而500欧元这一面额最大的纸币将不会有什么变化：由于已经成为犯罪分子锁定的目标，它将逐渐退出流通。**FD**

埃斯特·巴拉日 (ESZTER BALÁZS) 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



2017年年会 美国华盛顿特区

研讨会

2017年10月10—15日

在此次世界银行集团和IMF年会期间将举行世界级研讨会，讨论有关影响全球经济和
国际发展的重要议题。

欢迎加入讨论！



关注我们

#endpoverty

#IMFMeetings

如需更多信息以及注册详情，请浏览：

www.imf.org/fallseminars2017

